

# 应城膏矿史话

www.duxiu.com

# 应城膏矿史话

应城石膏矿矿史编与组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06·95 每册 0.15 元

# 毛主席语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 目 录

开头的話.....	1
一 从地下宝藏的开发谈起.....	2
二 盘剥工人的资本家和把头.....	4
三 来自矿外的掠夺者.....	8
四 昼夜不分的苦工.....	11
五 小小拖工苦难言.....	18
六 盐工恨.....	22
七 血腥的暴力统治.....	25
八 精神上的麻醉和奴役.....	29
九 系上无形锁链的奴隶.....	31
十 算不清的剥削账.....	33
十一 利润滚滚万骨枯.....	36
十二 登上革命的舞台.....	38
十三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44
十四 组织起来.....	46
十五 敌后短枪队.....	48

十六	反封锁斗争·····	54
十七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59
十八	红旗插上应城·····	65
十九	奴隶们站起来了·····	67
二十	百年矿山谱新歌·····	71
后	记·····	77

## 开 头 的 话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江汉平原。欢畅的富水河，象一条白色的玉带，沿着起伏的应城丘陵，伸向汹涌澎湃的汉江。它两岸宽广肥沃的土地上，银灰色的矿山井架和一根根高大的烟囱，矗立在宏伟的建筑群中；巨大的卷扬机在飞舞，无数的汽笛在欢叫；一辆辆满载着晶莹洁白石膏的汽车，从宽阔的选膏场开出来，穿过整齐排列着白杨树的林荫大道，箭一般地飞向四面八方。这就是著名的应城膏盐矿区。我们的矿区啊！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展现出一派特异的壮丽图景。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个具有四百多年悠久历史的老矿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加青春焕发，飞奔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但是，我们怎能忘记，在那夜沉沉、路漫漫的旧中国，膏洞工人的苦难生活！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象一条条毒蛇，缠在劳动人民身上，吸吮血汗。地主、资本家的昏暗、闭塞的膏洞，宛如一口口吃人的魔窟，不知吞噬了多少矿工的生命！

蜿蜒东流的大富水河啊！它是历史的见证。在它西岸东一堆西一堆由灰色矿渣堆成的坟墓般的小丘内，都洒满了矿

工们殷红的鲜血。小丘上现在有的已稀稀拉拉的长上了野草，有的还是生气毫无的干枯岩石堆。这些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膏洞，已经封闭多年，也找不到原来的洞口了。如果没有老工人的指点，青年人还不知道这些就是旧膏洞。可是，老矿工每次走过这里时，不能不回想起当年苦难的日子，仿佛看到了深埋在这些旧膏洞下面的阶级兄弟们累累的白骨，看到了阶级兄弟们为反抗凶狠残暴的地主、资本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要永远牢记旧中国膏矿工人兄弟们的血泪史和斗争史。

## 一 从地下宝藏的开发谈起

在那遥远的年代，由于地壳的变化，浩瀚的云梦泽波涛连天的壮观没有了，经过若干万年的变迁，沉积的泥沙层层覆盖，应城，这块海湖相连的地方，变成了矿藏丰富的肥沃原野。石膏就是这里地下万宝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人们常常这样自豪地夸耀说：“天上的白云千万朵，没有我们家乡的石膏多；地下的雪花白似银，没有我们家乡的石膏纯。”

这里的石膏矿床是嵌在地下岩石中的一层又一层的白色膏带，每层厚度从一、二厘米到二十多厘米，多至百余层，少的也有几十层。同时，由于矿物受水分的影响，在白色石膏层上下还嵌有许多青色的石膏。这些膏层，深的离地面约有四百多米，浅的在矿区可以看见露头。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应城西北地区团山一带的地层，因为受水、风、冰雪等

的侵蚀而破坏，离地面比较近的石膏矿层上端直接暴露出来。人们发现后，就开始了最早的开采，后来逐渐扩展。经过四百多年，以北山的王家庙，西山的潘家集，下山的龙王集三个集镇为中心，应城西北方圆二、三十里的范围内，膏洞星罗棋布，废石渣堆遍地皆是。

应城的石膏，洁白而细腻，呈结晶纤维状，一向以优质著称，不仅在国内久负盛名，而且还远销国外。

石膏的用途很广，工业上可作制造水泥的掺料，并可制成多种高级建筑材料；农业上可广泛在稻田里施用，起改良土壤提高产量的作用；医药上作清凉药料和外科的模型绷带；日常生活方面用于制作豆腐、豆干等。其中，以制造水泥和农田上施用的需要量最大。

应城矿区，不仅掘洞打膏，而且取卤制盐。特别是在历史上每一个战争年代，盐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超过了石膏的生产，有“盐的天国”之称。传说两百年以前，石膏开采以后，有一种蓝色页岩废石（俗称“蓝板”）抛出洞外。这种废石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之后，随着流水冲入农田，影响庄稼的生长。因此，人们才发现这种废石中含有盐分，于是便在洞里取水或用“蓝板”泡水熬制食盐，销售湘鄂两省二十余县。

这里又有舟楫水运的便利。解放前，各膏洞所产石膏都驮运到陈家河和湾上镇（早期在黄滩镇）的两个石膏行，在那里装上木船，经大富水河和刁汊湖驶入汉水，过载到较大的船只，运往汉口，再从汉口运销外地。

应城石膏产量，在二十年代后期，每年约达四万多吨。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每年约产膏五万到六万多吨。

一九三七年达七万四千万吨。那时，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石膏矿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食盐生产在最盛时期年产达六十万担。在抗日战争前几年内，每年约产十五万担。膏盐两项总产值，在抗日战争前几年内，每年约达三百数十万银元。在食盐产量较高的年份，膏盐两项总产值还大大超过此数。那时，全矿区的矿工约有八、九千人，制盐工人一万人左右，钻井工人等一、二千人；此外还有运输工人和船员等约七、八千人，共计约二万七、八千人，其中有一部分杂工和运输工是由附近的农民充任的。这股巨大的劳动力在这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果充分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每年生产的总产值还要超过上述的数字；即便保持这个总值，也应该能为矿区全体劳动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这里地下宝藏的开发却把劳动人民推入了苦难重重的深渊。这是因为这里的官僚、地主、资本家把丰富的自然资源霸为己有，并和封建把头勾结起来，用极端凶狠残暴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而他们榨取工人所得的暴利，又吸引了矿外的另一些官僚、地主、资本家纷纷前来瓜分赃物。在一批又一批强盗的相互争夺，同时又相互勾结下，膏洞工人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从而使这块富饶的土地成为工人受苦受难的一座活地狱！

## 二 盘剥工人的资本家和把头

解放前，经营石膏洞的都是私人资本家，过去称“洞商”或“矿工”。他们一般是本县或邻县的一些地主、官僚和商业

资本家，还有一些是原来的膏洞把头“上升”的。多数资本家每家占有膏洞一对，较大的每家占有膏洞二、三对到七、八对，最大的一家韩诚记曾占有膏洞二十对。抗日战争前夕，全矿区有膏洞七十多对，制盐厂一百零八个。

每对膏洞占用土地不多，不需要象别的矿山那样圈购大面积的土地。膏洞规模很小，设备又很简陋，开采都用土法，所以建设一对膏洞所需要的投资金额不大。但是，就连这笔不大的资本，资本家也舍不得全部由自己腰包里掏出。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拥有的特殊势力，采取“集股”和“拉账”的方式，拼凑一些钱，便购地雇工，开始打洞建井。在打洞时，一般不给工人工资，只供伙食。直到在地下打到“露白”，即发现岩石层中的可采石膏带时，才发给工人工资。如果膏洞位置选择不当，打不到石膏矿床而报废时，资本家便无耻地赖账，不给工人分文，对集股或拉账的钱也长期拖欠不还。应城人民管这种无赖行径叫做“穿着别人的皮袄打滚”。总之，每一对膏洞的建成，都是工人流血、流汗的结果，而靠掠夺起家的资本家一开始就对打洞工人进行残酷的榨取。

有“小汉口”之称的应城膏盐矿区是个“银钱窝”，这个“银钱窝”是用工人的白骨和血汗筑成的。矿洞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钱财，除了在上海、汉口和其他城市置办家业、开设行号，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多的盘剥外，就尽情地挥霍，过他们那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生活。

号称“应城半边天”的资本家韩诚记老板韩信廷，在县城和矿区韩家坝盖起了栋栋楼房别墅，建造了占地十余亩的花园三座，并专门雇用一批花匠培花育林，供他一家欣赏玩乐。

他还在湖南湘潭买了一座清朝官吏住过的“帅府”。他的女儿出嫁，单是用作陪嫁的礼物和送行的花费，就可以用银元铺四十多里路长。出嫁前，大摆筵席，每天一百多桌。出嫁那天，乐队、马队、轿夫、挑送嫁礼的达几百人，一个长蛇阵中，绫罗绸缎，金银饰品，衣箱衣柜，猪羊白酒，望不到尽头。资本家韩信廷为了摆阔气，这一天，还发给几百名陪送者每人“红包钱”五块银元。资本家能够这样挥金如土，全靠他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榨取。韩信廷不仅占有很多膏洞和盐厂，是一个吸吮工人血汗的大资本家，而且还是一个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他霸占农民的田地东起云梦，西至雷家山，北起安陆，南到应城县城。

资本家蒋富记，在县城修了花园还不满足，又在城西十里花园庙修起一座野外花园。为了来往方便，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供他们带着大小太太去逍遥作乐。老板蒋思德在汉口占有整个吉星里的房产。住在城市的高楼里，六十多岁了，还专门雇用两个年轻的奶妈，挤奶给他喝！

应城矿洞的资本家，一般就象上面提到的这些家伙一样，大都在远离矿区的“安乐窝”里居住玩乐，而把膏洞的管理和经营，一概交给封建把头。这些封建把头，控制着整个矿区的劳动力，垄断了各个膏洞的生产开采。每对膏洞开工时，资本家必须聘请一个大把头充任“都管”。“都管”受聘以后，承包洞下的全部开采工作，洞下所需要的工人也由他们安排。一般说来，一个“都管”承包一对洞，但也有一个“都管”向不同的资本家同时兼包几对膏洞的。每对膏洞的“都管”手下有两个“大监工”，每洞一个，具体掌管每洞的洞下工人。“大监

工”手下又有几个较小的把头，叫做“掌大锤的”，他们按照洞下所需要的工种，如锤工、拖工、抬工等比例，分别承包一定名额的工人。“都管”、“大监工”、“掌大锤的”这三层把头，通常是不下洞的；到洞下去的把头叫“做翼子的”或称“做班的”，这是把头的底层，他们也分包一定名额的工人。工人下洞做工时，“做班的”下去监工。工人一经与这些把头发生包工关系后，实际上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没有包工的工人叫做“独零子”，行动比较自由，但占工人的极少数。另外，统治洞下岸盐水工人的把头称“横门头佬”，盐厂的把头叫“大掌瓢子”、“二掌瓢子”。

这些封建把头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私产，向资本家包工，层层克扣工人们本来就很少的那一点工资养肥自己。大把头黄炳江不仅有良田一百余亩，而且娶有七个老婆。把头蔡么，房产一大栋，霸占六个老婆。只包两把锤的把头刘鼎松，他当了一年把头，就以四千多元买了二十亩田，并以三千元盖了一厢屋。

配合着封建把头制度对工人的统治，矿洞资本家还建立了反动武装。在早期，矿洞资本家合伙办了一个“保卫商团”，用来维护他们在矿区的反动统治。日本投降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除了资本家“同业公会”建立的“矿警大队”外，还有各膏洞的“自卫队”，人数从七、八人到三、四十人。这伙走狗、帮凶依仗反动势力，不仅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还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效劳。

应城矿区膏洞资本家，由于能够凭借着封建把头和反动

武装任意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石膏开采方法的改进，对使用机器，就没有兴趣了。这样，应城膏盐的开采，虽然经历了不少的年代，但生产技术一直十分落后，到解放前夕，仍然是手工操作。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和封建把头统治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 三 来自矿外的掠夺者

榨取应城矿区工人血汗的，除了矿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外，还有来自矿外的掠夺者，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收购石膏的机构，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所谓“公司”、“膏局”、“商号”。它们通过对石膏购销的垄断剥削工人。

一九一六年以前，各膏洞所生产的石膏，自由地卖给当地的贩运商人。一九一六年开始出现了“申帮”商人组织的“应城石膏公司”，对矿区石膏的收购进行垄断。不到一年，湖北军阀、官僚插手进来，停止了这个公司的营业，代之以由“汉帮”商人、膏洞资本家和应城本地的官僚、地主合股组织的“应兴石膏公司”。这个公司以每年“报效军饷”十万串的条件与湖北省军阀瓜分垄断利益。从此，应城石膏的厚利成为湖北省和应城地方的大小军阀、官僚以及膏洞资本家间瓜分掠夺的对象。他们之间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的结果，使矿区收购石膏的机构频繁地变换名称。从一九一八年“应兴石膏公司”垮台起，到一九三〇年，先后出现了由湖北省官方更多的插手或完全由官方包办的“石膏官局”、“官督商办公司”、

“官膏总局”、“石膏专卖局”等多种机构。一九三一年起又改为“商办”，由应城地方的官僚、地主和膏洞资本家成立一个“商号”，一九三二年七月，扩大为“应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石膏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垄断石膏的销售业务，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三个年度中，共攫取暴利七十二万多元。平均每年达二十四万多元。而这个公司的资本额为八十万元（当时实收额还不到八十万元），这就是说三年之内所掠夺的暴利几乎与实收的资本相等。利润之高，当时在国内是很突出的。所以，“石膏公司”也好，“石膏官局”也好，和矿洞资本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靠榨取矿上工人的血汗发家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汪伪组织的名义，成立“应城膏盐公司”，对矿区膏盐生产进行残暴的统制和掠夺。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样成立了一个“石膏公司”，垄断石膏的收购。总的说来，矿区的石膏收购机构，历年来虽然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挂上了不同的招牌，背后有着不同的后台老板，但都是为了霸占应城的石膏市场，独吞贩运石膏的利益。他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尽量压低石膏收购价格，以便从转手出售中牟取更多的利润。他们所贩卖的就是矿工们所开采的石膏，所以，他们所获得的暴利，就是矿工们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果实的一部分。

“官膏局”和“石膏公司”为了牟取暴利，尽量压低石膏的收购价格，这实际上就是从膏洞资本家手中夺去一部分利润。而限制石膏收购数量，又使膏洞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因而也影响了膏洞资本家的利润收入。为了补偿这方面的所谓“损失”，膏洞资本家总是力图从不断加重对工人的剥

削中找“出路”。所以，膏洞资本家对工人采取了更多、更凶狠的剥削手段。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不断降低工人伙食标准，减少包工名额，延长劳动时间，强迫工人多干活等等，这样就使工人过的日子更苦了。

到矿区来瓜分石膏收入的，不仅只是军阀，官僚，“申帮”、“汉帮”商人，还有银行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反动地方政府。应城和汉口两地的银行和钱号，通过对矿洞资本家和“石膏公司”之类组织的放款，以收取高额利息的形式，分享了产销石膏中的一部分利润。商业资本家在矿区通过对膏洞供应物资，对工人赊销生活用品，又盘剥了不少钱财。应城反动地方政府则巧设名目进行勒索。据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的应城县长供认，全县以“教育建设及其他公益事业”的名义，从膏盐生产中每年取得的收入达十六、七万元之巨。这些搜括和勒索最后都落到工人身上，使工人受到更加残酷的榨取。

解放前，应城矿区工人就是处在这样层层剥削、压迫和掠夺之下，过着长夜难明的苦难日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膏洞工人过去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剥削、迫害和掠夺，归根结底，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这三重压迫的具体表现。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才能使膏洞工人得到彻底的解放，才能使地下资源的开发为劳动人民带来幸福。

## 四 昼夜不分的苦工

如果说“阴间地狱”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虚构，是威胁造反的劳动人民的鬼话，那么，人间地狱却是实有的，它就在一一切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里。旧中国应城矿区那一对对膏洞，就是一座座坑害劳动人民的活地狱！在这一座座地狱里，矿工们所受到的折磨，单就劳动条件的恶劣和劳动的沉重来说，就要令人发指！

首先，下洞就是一场灾难。洞口的吊车早期用“木车”，就是用人工旋转的木辘轳；稍后用“洋车”，就是一个铁制滚筒，两端装上车轮，用人工旋转车轮，工效稍高。洞口搭一座木架，用麻绳拴在架上，麻绳的一端缚上杉树棍子，工人下洞时，坐在这根棍上，两腿下垂，用手拉住吊绳。绳索下放时，摆动很剧烈，而井洞很小，直径只有一米左右，洞壁又打得很粗糙，凹凸不平。因此，工人常被洞壁碰得皮破血流。有时绳索断了，把人活活摔死。每上下一次洞，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后来，有的膏洞装上了柴油机，起重力量大些，每次可带二、三人，但由于洞小，上下洞时仍有碰到洞壁的危险。

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仅不设法改善井筒装置和提升设备，反而与把头勾结起来，以提升能力有限为借口，强迫下洞的工人长期留在洞下劳动，尽量延长换班日期。资本家和把头还派狗腿子严密把守洞口，把吊车牢牢控制起来，使工人下洞后妄想逃跑也插翅难飞。这样，工人被迫在洞下连续

劳动，每次最少都是二、三十天，经常达到三、四个月或五、六个月，有的竟长达八个多月！有些新来的工人，在阴暗、潮湿的洞下干了四、五十天后，实在被折磨得忍受不了，向把头要求出洞时，经常听到的回答是：“你碴灰气还没有闻到，就想出去了？”长时间的洞下干活，往往把初次下洞的工人弄得神经失常，迷迷糊糊，只知道跟着别人机械地动作，思考能力大大减弱了。膏洞工人所受到的这种难于想象的虐待，是世界上少见的。这突出地表现了膏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压迫的极端残酷性。当时，洞下工人中传唱着这样一首悲愤的歌：

世间都说牛马苦，  
那有我的苦水多，  
牛马夜间有闲时，  
我做活来没休止。

洞下的劳动是以锤工在槽口斫膏为中心。槽口就是采膏工作面，很矮，一般只有两尺来高，连坐着都不能直腰。锤工们干活时，只能侧身斜坐，七、八人或上十人拉成一线，每人在左足的拇指和食指间夹住一把打膏斫子，左手抓住斫把，右手抡起锤子向斫把打去。那时，对斫膏的要求是把石膏层上面或下面的岩壁斫成一条深约五十厘米、高约六厘米的槽。对每个锤工的定额是每一昼夜斫六米长这样的槽，然后把石膏一块块撬出来。要完成这个定额，大约需要打锤两万次。用侧身斜坐的姿态，长期干这样沉重的活，使工人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被折磨成“歪屁股”，走路时成一摆一摆的畸形。现在许多老矿工走路时还是这个样子，这是万恶

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残害劳动人民的一个见证！

锤工斫下来的石膏，由拖工装上木拖车，经拖巷拖到抬巷。然后由抬工装入篓子，一般每篓装四百多斤，两人一篓的抬到洞口，交专管吊车上下的天洞工吊上地面。抬巷既矮又窄，人在巷内不能直立，所以抬工抬运石膏时，要弯着腰，歪着脑袋走路，但就这样还是常常被岩壁和巷顶擦伤皮肤碰伤头。抬工在抬巷里干活久了，造成两肩高矮不一，肩头磨伤的地方往往烂得长蛆。至今有的老工人身上还留有累累的伤痕。

抬巷抬膏要弯腰，  
槽口打膏扭断腰，  
矮巷拖膏爬地跑。

这就是对洞下工人劳动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

工人在资本家的膏洞里长年累月艰难地劳动，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血被资本家吸尽，肉被资本家吃光，而狠心的把头还要在工人身上敲骨吸髓。把头向资本家承包膏洞生产后，资本家按把头提出的工人名额付给工资和伙食费。各级把头为了捞到一大笔钱财，就以提高工人的劳动定额和减人不减活的办法，虚报工人名额。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比如一个膏洞名义上由三十二把锤承包（以锤的数目配备锤工，按规定是一比一点五），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把或二十四把锤生产，其余的六把或八把锤的锤工名额的工资和伙食费都由把头侵吞了，而生产任务则分摊到上班的锤工身上了。同时，拖工和抬工的名额是随着锤工的人数多少配给的。把头侵吞了锤工的空额，也相应地侵吞了拖工和抬工

的空额。此外，按规定拖工和抬工的人数还随着巷子的延长而增加，但由于把头要吃空额，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这又大大地增加了拖工和抬工的劳动强度。因此，如果按规定配足生产人数，每个工人每天的活，二十小时能干完的话，那么，在大小把头层层克扣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人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劳动，有时甚至每天干二十四小时还不能把活做完。这时，把头便使用各种酷刑来惩罚工人，以使工效提高。有个工人叫罗林苟，因为干不完当班的活，被把头打得鼻血而死。

工人们在洞下日日夜夜无休止地干活，这是违反人的生理条件的。可是吸血成性的资本家和把头都不管工人的死活，硬是不让工人有睡觉休息的时间。怎么办呢？工人们也想出了许多法子寻找机会睡一会儿。比如：把头不在自己的身边时，就地闭上眼睛打个盹；把头离自己稍远一点，就用最慢的速度斫膏，以半休息半劳动的方法蒙混把头。要是实在困得要命，把头又在自己的身边，就借故要拉屎屙尿，跑到废巷里蹲一会，但往往一蹲便不知不觉的倒在地上睡着了，工人把这种睡觉叫做“做阴班”。可是这“做阴班”时间稍长一点，被把头发觉了，就要遭到毒打。

资本家和把头对工人的这种非人待遇，常常逼使工人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这里只讲资本家陈宝泰的鲫鱼田膏洞里的一次罢工斗争。这个洞的劳动条件特别恶劣，洞下工作面不断冒水，地上泥泞不堪，槽口和拖巷的地势很陡，因此，拖工拖膏极为困难。为了防滑，拖工们就在地上挖了很多踏足阶梯。但是

由于地势太陡，还是常常翻车。就在这种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有一年，六十多名拖工，连续干了五十多天，许多人都累病了，就这样，拖的膏还是供不上吊车。因此，拖工们再三要求把头派人来换班，可是结果把头只派来两个人。拖工们忍无可忍，大家商量决定破坏柴油机，并委托两个出洞休息的伙伴去执行。这两个只有十岁左右的拖工，肩负着阶级兄弟的重托，出洞以后，串连了几个正病倒在茅棚里休息的伙伴，要他们在洞口附近放哨，他俩则不顾疲劳，冒着生命危险，于半夜溜进机房，潜入大木桶做的进水池里，将柴油机的进水管堵死。不久，柴油机冷却箱就爆炸了，全洞被迫停产。资本家派人到武汉买配件，往返需要六天。这样，洞下工人获得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休息。

工人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干活，而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却只给他们两餐饭和一餐大麦饼子吃。饭很粗劣，常常是霉糙米做的，谷子、砂子成堆，又冷又硬。菜是霉腌菜、烂萝卜、老苋菜等。洞下也没有碗筷，大家就用沾满了碴灰的手抓着吃。饭菜这么坏不说，量也少得可怜，工人们根本吃不饱。

吃饭又是工人计算做工天数的唯一依据。因为洞里不分昼夜，工人于是每吃两餐收藏一块石子，作为记做工天数的凭证。但这不一定准确，因为狠心的把头有时会少开一顿饭来蒙混不晓得钟点的工人。结果，下洞的时间越长，越弄不清准确的天数，而把头便利用这一点来克扣工人的工资。

洞下没有机械通风设备，洞内也就又闷又热。工人下洞后都赤身裸体地干活。洞里点的是阴暗不明的油灯，散发出

浓厚的油烟子；研膏时，粉尘飞扬；加上工人大小便都在洞里，因此洞里空气污浊不堪。粉尘中的盐分含量也很大，工人身上的汗水与粉尘混合后，对皮肤有很大的刺激，使工人常年生疮长疱。更为严重的是汗水和盐卤流入眼睛，使很多人眼皮发炎后溃烂，工人们管这叫“黑眼睛病”。成年累月的洞下生活，还使工人害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和矽肺病。工人在洞下吸入大量的灰粉和油烟，吐出来的痰都是乌黑的。解放后已经二十多年了，可现在老工人吐痰时，还是吐出一口一口的黑痰。这是万恶的旧社会资本家残害工人的又一个罪证！

工人在洞下长期干重活，是多么盼望出班啊！在洞下，可以经常听到工人唱着：“东不想，西不想，只望杉树棍子在井筒里响（即换班）。”有个锤工叫蔡痢痢的，把头贵德老十长期不让他出洞，他实在受不了这个罪，一横心，自己用斧头把左足拇指砍掉，想从此不当锤工了。残忍的贵德老十却凶狠地说：“你把脚指砍了，砍了就放你出洞？快把脚指包起来给老子打膏！”

还有个工人连续干了三个多月的活，累得精疲力尽，可把头硬是不准他出洞，于是，他就趁空饭簋子吊上去的机会，爬了进去，想偷偷地出洞。哪知空饭簋吊到洞口时，忽然被把头发现了，狠心的把头就着把空饭簋子连人一起摔下三、四十丈深的洞底。恰好落到一个水坑里，才侥幸没有摔死，被别的工人把他救了出来。

出洞了又怎么样呢？长期在洞下干活的工人一到地面上，双眼一见阳光，刺痛难忍，眼泪直往下流，有的只觉得

浑身瘦软，眼前天旋地转，一下子昏倒在井口。大伙再互相一看呵，真是令人心酸！只见一个个头发胡子长长的，遮盖着两耳和脸额，面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浑身骨瘦如柴，枯皱的皮肤长满了“风疙瘩”。这真是“三月下洞腊月上，爹妈不认儿子相！”

工人出班之后，没有家，没有住处，也没有铺盖行李。老工人愤怒地控诉道：“过去工人只有三件宝：芦席、裤袄、破棉袄。”他们只有睡在膏洞旁边比牛棚还不如的“栈房”里。一个膏洞几百名工人，就是这么一间破茅草棚，尽管大家只有在轮到自己休息的时候，才到这里来睡觉，但连同地面工人，也常常有几十人挤在一起。棚内没有床铺，冬天在地上铺点烂草，夏天在地上垫几块破芦席。没有被子就把“四季衣”，就是自己仅有的一件破烂不堪的长土布袄盖在身上。逢着隆冬腊月，大伙实在冻得没有法子，常常把狗子和猫唤来暖脚！那时，工人诉苦道：

漏水草棚是我的屋呀！

破烂芦席是我的铺罗！

过风棉袄是我的被啊！

只有拉狗猫来做伴罗！

工人们出班后，一个个倒在地铺上就睡，整天整晚睡得象死人一样，也没有人过问。那时，大伙愤激地说：“在洞里，我们是埋了没有死；出了洞，我们是死了没有埋啊！”

工人们在膏洞里，夜以继日，长年累月干活，弄得疲劳不堪。出班了，这该多休息几天吧？不，不能！“资本家喝血，把头剥皮。”老工人一言就道破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道出了工人们不能多休息几天的原因。比如膏洞资本家规定工人上班和轮休的人数比例是二比一，按这个规定，工人平均做两昼夜，休息一昼夜，即工人平均每昼夜劳动十六小时。这样长的劳动时间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这仅仅是我们按资本家规定各个膏洞应配备的工人名额所作的推算，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前面已经说过，贪得无厌的各层大小把头，为了捞得更多的钱财，他们层层虚报工人的名额，以便吃空额，因此，真正配备的轮休工人是很少的，往往不到上班工人人数的十分之一。到了石膏销售旺季，常常连一个轮休工人也没有。这样就使工人下洞后长期得不到轮换，而出班后，休息不到三、两天，又被赶下洞去干活。老工人陈三，幼时在膏洞里当拖工。有一次，他在洞下一连干了一百二十八天的活。出班后，在茅草棚里睡了一天，还没有睁眼，突然被把头的鞭子抽醒，又把他拖下去干活了。

## 五 小小拖工苦难言

解放前，膏洞里的工人有一半是七、八岁到十三、四岁的拖工，他们所受到的苦难还要深重。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什么要大量使用童工做活呢？

原来，唯利是图的矿洞资本家，为了投资小，得利大，就把他们经营的石膏洞打得十分粗糙，巷子矮小狭窄，特别是从槽口通往抬巷的运输巷子（俗称“拖巷”）通常只有两市尺高。在这样又矮又窄的巷子里，成年人坐着也要歪扭身子，

行动就更是艰难。因此，要把槽口采出来的石膏运到抬巷，就只能利用童工来充任运输石膏的“机器”。

再说，资本家以为童工无知，懂事不多，可以随他们摆布，随他们欺负。工资可以少发，甚至不发。

童工拖膏时，用一根麻绳系在腰间，从胯下穿过，将麻绳的另一头套在木拖车头的两角上，然后靠四肢来回爬行。就这样爬行，背脊还常常被巷顶擦伤。有的膏洞里的拖巷打得还要矮，童工拖膏时只好跪在地上爬。膝盖被磨得鲜血直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拖着七、八十斤到一、两百斤重的石膏，不分昼夜干，一搞就是几十天甚至半年，这是十分沉重的折磨。许多天真活泼的儿童入洞后，因受不了这种折磨而惨死了！侥幸活下来的，身体也被折磨成挺胸凸臀的畸形，浑身伤痕累累！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资本家和把头搞的一套边吃饭、边劳动的办法。他们派人把饭篓放在工作面通往拖巷的转弯处，由把头守着。拖工拖着石膏经过那里时，把头让他从饭篓里用手抓一把饭塞在嘴里，同时又扬起鞭子打他一下，吆喝他赶快拖石膏。待他第二次拖着石膏经过时，把头又让他抓一把饭吃，同时又给他一鞭子。这样，每个拖工就要拖很多趟石膏，挨很多下鞭打，才能把一顿饭吃完。每顿饭供应的饭菜很少，如果不尽快的拖膏，饭菜篓就空了。这样边拖石膏边挨鞭子边吃饭，又怎能吃得饱呢？所以，当大家把饭吃完了，把头走开了，没有吃饱的拖工就去抢饭篓里的残菜剩饭，抢不到的，就在地上捡起饭粒和残菜来吃。拖工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劳动，把头只给他们吃两餐饭，一餐大麦饼

子（俗称“四角头”）。吃大麦饼子时，也不能停止劳动。拖工中流传着一首号子：

东山高，  
西山陡，\*  
怀里揣个“四角头”，  
走一步，咬一口，  
“做班的”坐在巷子口，  
扬着鞭子把我抽，  
他还骂：“快走！快走！”

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拖工们的反抗。

有一年，在资本家韩诚记开的斗三洞，因为采膏工作面越开越远了，按照规定，抬巷应该往前延伸，但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省钱，不派工掘长抬巷。这样，拖工们拖膏的路程越来越长，劳动量大大增加。他们再三要求掘长抬巷，都遭到了把头和本家家的拒绝。于是，洞下所有的七十多个拖工凑集一起，把心一横，决定干脆摔下“拖子”罢工！他们用石膏和废碴把通向各条拖巷的口子堵起来，只留下一个碗口大的哨孔，由个子较大的十多个拖工轮流在哨口警戒，其余的拖工就躺在巷子里睡大觉。吃饭由锤工、抬工给他们送。

这样搞了两天后，大把头全坤老么见没有石膏吊上洞来，慌了脚手，一打听才知道是洞下拖工罢工了。他赶紧下洞去查看，找了好一阵，才发现拖工们都在巷子里躲着。他先想来

---

\* 指槽口和拖巷的地势。

软的，就扒在拖巷子跟前说：“你们哩，有么事好说，为么事都躲起来了？”

在哨孔警戒的大个子土工说：“不为么事，你只要把抬巷往里掘，再答应过几天叫人来换我们的班，我们就出来拖膏。老子们接连干了六十多天了！你们是肉做的，我们就不是肉做的？”

全坤老么把脸一垮说：“那由不得你们！”

那大个子土工见这家伙还要抖威风，想起他平常无故毒打弟兄们的情形，不觉火上心头，骂了一句：“你还抖个屁威风，老子们今天豁出来了！”接着就顺手捞起一坨石膏，朝把头的头上掷去。全坤老么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捂住伤口，一边跑一边骂道：“这还得了！看老子收拾你们！”

这时，小把头宝老么走近全坤老么跟前，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全坤老么连说：“妙！妙！”不一会儿，这两个坏蛋就四处找来一些烂稻草，堆在拖巷子，用火点着，转眼便冒起浓浓的烟子。接着他俩就用衣服不断地把烟子往巷洞里煽，一面煽一边骂：“不出来就熏死你们！”

殊不知土工们早有准备，烟子一进洞，他们就把事先打湿的抹汗袱子蒙住口鼻，还用衣服往洞外面对煽，一点也没有被熏着。

大把头全坤老么见烟熏无效，又想不出别的法子，怕膏洞停产时间长，资本家骂自己，没有办法，后来只好又亲自给土工们送来蒸肉、麻饼，赔礼道歉，口头上暂时答应了土工们提出的要求。

## 六 盐 工 恨

石膏和食盐是伴生矿物。应城矿区地下岩层中食盐富集带有很厚的岩盐。解放前，由于应城矿区的采矿技术落后，一直没有找到岩盐带，那时，都是利用石膏废洞灌水溶解夹杂在洞壁中的零星盐层，然后取卤熬盐。制盐卤水从石膏洞内转运到地面，全是人力，把卤水制成食盐又是土方法，这就使工人遭受着凶狠的剥削和压迫。

先从卤水是怎样从膏洞提升到地面说起。资本家先派人在洞内下山的巷子内筑起一道道土堤，把巷子分成若干个水埕，每埕约三丈长，然后每埕安排一个戽水工人，用小木桶，俗称“碗子”，把巷子低处的卤水，一埕传一埕的戽到井筒底，然后用大木桶吊上地面。

戽水工人是全矿区诸工种中受资本家及把头的剥削和压迫最深的工种之一。他们的干活时间，与膏洞里的工人一样，不分昼夜。每一次下洞也是要在洞里连续干三、四个月或半年以上，才准出洞休息一、二天。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却比膏洞里的工人还要恶劣。因为巷子经水泡以后崩塌很厉害，顶板破裂不堪，极不安全，常常砸死工人。同时，本来就矮的巷子由于崩塌，变得更矮了。工人干活时，稍高的地方还可以扭着身子坐着，如果巷子太矮，就要把身子仰卧或俯卧在咸水埕里戽水。由于工人们干活时不能自由行动，大小便也解在水埕子内，随水漂流，到处皆是，巷子里又不通风，恶臭气味令人呕吐。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长期干活，使工人们

个个得上了关节炎、皮肤病和眼病。最令人发指的是，工人们身体长期泡在咸水里，身上的肉一块块腐烂往下掉！这哪里是什么劳动，简直比坐水牢还不如！

工人们日以继夜干活，把头还不让大家吃一顿饱饭。易家山洞，有一天吃饭，戽水工人有三、四十人，可只送来两小簋子饭，大家都没有吃饱。这时，有一个工人只说了一句：“饭都不给人吃饱！”把头易想林听见后，就用鞭子劈头盖脑地打他。那人忍无可忍，一脚把易想林踢倒了。送饭的是易想林的弟弟，看到哥哥被踢倒在地，随即拿起扁担，朝那个工人身上乱砍。那个工人的四肢都被砍断了，晕倒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正在地上耍无赖的易想林，还不罢休，他一家伙从地上爬起来，拖起打晕了的那个工人，扔入盐水埕里。工人们闻讯一涌而上，把那个工人从盐水埕内救出来时，那人已经死了。工人们万分气愤之下，抱住易想林兄弟二人，你一拳，他一脚，顿时将易想林打得昏死过去。

洞下的盐水运上地面后，由地面上的盐棚工人先作日晒处理，再用铁锅熬煮，直至水分蒸发完后，便得食盐。

资本家经营的盐棚，因为是土法生产，设施简陋，也没有什么安全保护。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干活，常常发生死亡或残废等重大事故。拿熬盐来说，工人站在灶台上操作，常常因工作时间长，睡眠不足，或者是把头强迫工人带病工作，往往掉进沸腾的盐锅里烫死，有时被蒸气冲死。至于盐水烫伤那更是常事。在夹堰堤的盐棚里，象这一类人身安全事故就很多。有一次，有一个姓陈的工人，因身体有病，把头强迫他上班，结果，头一昏眼一黑，掉在沸腾的盐锅里烫死了。

他死后，资本家黄祥记连棺木都不给他买，只用了一张烂芦席，把尸体包了一下，就扔到炭碴堆里去了。工人们气愤的说：“资本家把我们工人不当人，工人死了，就象死了猫子、鸡子一样扔出去就了事！”

如果工人在生产中，把身体搞病或搞伤了，轻一点的你自己去请人顶替。这种顶替别人做工的人叫“抵工”。抵工是临时雇请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一点才能请到。因此，工人病了或受伤了，自己不但没有工资，而且还要垫付别人的工资。这个道理又何从说起呢！如果工人的病或伤稍重一点，就要遭到解雇。矿区有个姓彭的棚工，因眼睛在熬盐时被蒸气冲伤，有十多天不能上班，“掌瓢子”（把头）就叫他走。老彭是外地来的孤人，眼睛又受了伤，这时又正是寒冬腊月，叫他到哪里去呢？工人听到以后，气愤极了，就把熬盐的炉火泼灭，然后大家一同去找“掌瓢子”，提出抗议：“如果叫老彭走，我们同他一起去讨饭！”在工人们的强烈抗议之下，老板才勉强留下老彭。

资本家经营的盐棚，生产情况是随着盐在市场上的销路宽窄和天气好坏而变化的。因此，盐棚工人常常遭受失业的威胁。如在雨季里，碰上连绵阴雨，盐土晒不出来，熬盐就要停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就不发工资。这实际上就是对工人的短时期的解雇。资本家这样作，曾引起了广大工人许许多多的自发性罢工或其他形式的反抗。

有一年五月的一天，宋福记盐棚的晒盐场里，晒着可熬制两万多斤盐的盐土。晚间大风骤起，乌云滚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了。“掌瓢子”心慌意乱，领着一群狗腿，急

急忙忙闯进工棚大喊大叫，要工人们起来抢收盐土。可是全棚四十多个工人都躺在地铺上一动不动，好象睡得很熟的样子。原来，大伙早就被资本家在雨天随意变相解雇的作法激怒了，眼看一下雨，自己又将没有活干，所以在狗腿们进棚以前就商量好了，要乘机会把老板惩罚一番。“掌瓢子”见叫无人理睬，喊无人答腔，就气急败坏的扬起鞭子要打工人。哪知他的鞭子刚刚举起，工人们就一哄而起，把“掌瓢子”和狗腿们团团围住。许多曾被他们毒打过的工人，乘此机会，从人缝里，捏紧拳头，象雨点般的打在他们身上。往日耀武扬威的“掌瓢子”和狗腿子，这时却象缩头乌龟一样，双手捧着头，连声求饶说：“弟兄们，有什么话好说，好说……我们转告老爷，尽力办到。”这时，人群中有一个嗓音宏亮的工人气愤地说：“你们趁早滚回去，把‘鬼不缠’老板叫来同我们谈。要不，我们今夜不但去收盐土，也不轻放你们！”在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坚强斗争下，“鬼不缠”老板宋福记不得不答应了工人们的大部要求。

整个膏盐矿区，象这样的斗争事迹还很多。如燕子山蒋贵记盐厂工人，为了治服把头黄老三，在产盐旺季里一齐跑到别家盐厂去做工，使这个盐厂被迫停产一段时间。

## 七 血腥的暴力统治

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驱使工人尽量多干活，矿区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狼狈为奸，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酷刑，对工人实行血腥的暴力统治。

在膏洞里，各个工作场所都有把头监视着工人干活。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鞭子，一种是用长竹板做的鞭子，叫做“竹皮鞭子”，砍在人身上是一条条的血梗；另一种是用三股牛筋扭成的鞭子，叫做“猴头鞭子”，打在人身上鼓起一个个的血泡；再一种是用钢丝编成的鞭子，叫做“黑头鞭子”，钢丝一根根竖起，打在人身上皮破血流，疼痛难忍。把头们总是嫌工人干活太慢、太少，一边骂，一边扬起鞭子打人。骂声和鞭子声此起彼伏，没有休止。把头走开了，就可以听到拖工们一边拖着沉重的拖子，一边用低沉的调子唱道：

东山陡，  
西山陡，  
“做班的”坐在巷子口，  
猴头鞭子，  
黑头鞭子，  
打得屁股鲜血流。

嗜血成性的资本家和把头认为简单地用鞭子抽打，不足以压服工人，驱使工人为他们拚死拚活地干活，还采用了许许多多的酷刑来压迫工人。

第一种叫“跑马射箭”。把头躲在拖巷的暗处，当拖工拖着石膏经过他身边时，便冷不防抽拖工一鞭子。这时，拖工如果不赶快向前爬，就会接二连三地挨鞭子。把头用这种方法来强迫拖工在矮巷里飞快地爬行拖膏。

第二种叫“猴子观灯”。工人们长时间在洞下劳动，得不到休息，常常困得睁不开眼睛，做活动作不听使唤。把头看见后，就用点燃了的油灯草，贴近工人脸部摆动，或者把油

灯草点燃后，挂在顶板上，强迫工人脸朝油火，这样灯草上的油火便纷纷落在工人的脸上，灼痛难忍。把头们用这种方法来逼使工人提起精神干活。

第三种叫“腌盐蛋”。这是把头用来镇压工人怠工或反抗的一种刑法。工人受到了把头的残酷虐待后，有的起来直接反抗，有的用逃跑或怠工的形式来抵制。把头就把这些工人捆绑起来，先用鞭子毒打，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时，再推到含有盐分的矿石灰粉中滚动，使受害者伤处与含有盐分的灰粉接触后，浑身痛如刀割。

第四种叫“过火油山”。拖卷的顶板上，沿途挂着点燃了的油灯草。赤身裸体的拖工拖运石膏时，被迫迅速通过每一挂油灯草。要不，那象雨点般的油火星子落在身上，马上烫起一个个的燎泡。

此外，还有许多灭绝人性的酷刑，什么“活剥皮”、“放羊吃草”、“游四门”、“披麻戴孝”、“树上吊人”、“活埋”等等。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刑法呢？？让我们听听老工人的诉说吧：

活剥皮，最狠心，  
鞭子打得伤满身，  
泼上盐水把伤口润，  
叫你痛得晕沉沉，  
推到巷口风来吹，  
让你全身沾灰尘，  
灰尘沾肉分不开，  
一块一块剥下来，

疼痛如同刀子割。

羊吃草，不平常，  
麻索穿在耳朵上，  
把头看你打膏慢，  
猛拉麻索叫你干。

游四门，游四门，  
拖架油桶颈上戴，  
手敲油桶“四门”游。  
“人人莫学我偷懒，”  
走一步来喊一声，  
把头的鞭子不离身。

解放前，应城矿区里有许多阶级兄弟，因为遭受这些酷刑的迫害而惨死在洞下。拖工罗毛被把头周金山用鞭子活活打死。刘忠和，十二岁，在洞下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拖膏的动作慢了些，被把头在拖巷里设置的“过火油山”酷刑烧晕倒了。把头见了，还用鞭子毒打他，见他还是没有醒，又用拖子朝他的头部猛击，刘忠和当即惨死。工人芦元义的哥哥和弟弟，都是死在把头的酷刑下的。芦元义的弟弟，十二岁，因为身体被折磨成病，不能坚持干活了，要求出洞。把头硬说他是“不想干活”，先用钢丝鞭子打得他浑身鲜血淋淋，然后又用盐水泼到他的身上。顿时他痛得在巷子里乱翻乱滚。没有多久，就活活地痛死了！临死以前，芦元义赶到弟弟身旁，弟弟的双眼迸射出仇恨的烈火，并用咬破了的嘴唇颤动着说：

“大哥、我——都死——。就你——一个，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死了！一个个罪恶的膏洞里，如同一个个豺狼窝，不知吞噬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啊！

资本家从矿区里运走担担食盐、抬抬石膏，这担担食盐是工人的血汗熬成，这抬抬石膏是工人的白骨堆砌！要说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迫害，真是说不完、写不尽。一九三六年春，在资本家方德记的洞里，有一个叫梁想生的工人，他在洞里一连干了几个月的活，出洞后，才休息一两天，把头又要他下洞。他想多休息一两天，就不愿意下去，把头拿起扁担就打，扁担打断了三根。梁想生的腿子被打断了，成了残废，躺在膏洞旁的茅草棚里整整半年，资本家也不给他治疗。当时，资本家要关闭这个膏洞，到别处去打新洞，看到他不能干活了，就叫人把他用草包捆住，扔到废碴堆里活活的埋了！埋时，还听得见这个弟兄叫喊：“我还没有死，你们好狠心呀！”在旧社会，资本家就是这样野蛮地随意糟害我们工人的生命！

## 八 精神上的麻醉和奴役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了替他们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作辩护，还大肆宣扬鬼神迷信，对工人进行麻醉和欺骗，妄图平息工人的反抗。

童工拖膏时经常被顶板擦破背部，溃烂成疮。这本来是资本家只图赚钱，把巷洞打得又低又矮造成的，可把头却胡诌什么是“黑老鸦抓的”。

工人们常常在洞下昏倒过去，这本来是资本家迫使他们在洞下长期无日无夜连续劳动，见不到阳光、吃不饱饭造成的，可把头却瞎说什么是因为“偷懒”被“白胡子老头”抓去了。把头们还捏着鼻子哄眼睛地说，膏洞巷子里的“走礅”——就是木支柱——受潮后长出的白色霉毛，就是所谓“白胡子老头”。

洞里经常发生“冒顶”、“穿水”事故，工人大批大批死亡。这本来是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连起码的安全设备也不搞造成的，可把头们却乱编一气，说这是由于什么工人们“保护下班佬的洞神爷”敬奉不周。为了使大家相信真的有什么洞神爷，资本家和把头在矿区集镇上和膏洞口修起了“洞神庙”，树起了“洞神碑”，要工人每逢“五”（端午节）、“八”（中秋节）、“腊”（阴历除夕）和每月初一、十五，以及每次下洞以前，给“洞神爷”烧香磕头，抽签上油，捐钱供奉。

除了“国产”的鬼神外，资本家还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利用“洋神”来愚弄工人。一个姓廖的资本家兼地主，就捐钱在矿区中心地带的坝子上盖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内的神甫，那些帝国主义派来的文化特务，利用所谓“讲经传道”，向矿工们散布“天堂”和“上帝”的幻想，妄图使工人们安于自己的悲惨处境。

各种各样的“鬼神”妄说，西方来的“天堂”、“上帝”的胡诌，掩盖不了活生生的现实，掩盖不了血淋淋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应城矿区工人回答资本家和把头的，是坚决的反抗和斗争！

## 九 系上无形锁链的奴隶

膏矿工人在洞下干活的痛苦，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不是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所能隐瞒得了的。在当地人们中间，这些魔窟里的种种惨状早就被广泛地传开了。“膏洞上的饭，拿命换。”谁又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到这个虎口里去呢？所以本地的劳动人民，尽管受到官僚、地主、富农的迫害，穷得没有饭吃，宁肯出外讨米，甚至饿死，也不愿意到膏洞里去做工。资本家和把头用通常的招雇办法招不足工人，于是，他们就采取诱骗、拐带等各种手法，把不明底细的穷人，特别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哄下洞去。你只要一落入这个火坑，资本家和把头便用一根根无形锁链把你捆住。

一九三四年，从应山来了二十多个农民到矿区买盐。那时，正逢洞下的工人很缺，把头陈老四便对买盐的农民说：“现在盐很缺，要等两、三天后才有，在这两、三天里，你们没得事，就下洞去做些活，赚点钱，回去时做盘缠，不是很划得来吗？”买盐的农民被骗下洞后，一看形势不好，想不干了，把头陈老四的爪牙丁么便在洞里拔出手枪逼着他们干活。他们一连干了一个多月，把头还不让出洞，他们就起来反抗，把丁么痛打了一顿，但吊车控制在把头手里，他们还是出不了洞。把头们于是进行反扑，在搏斗中，两个农民兄弟牺牲了。其余的后来受尽了折磨，才被放出洞来。

因为光靠在本地拐骗外来的穷人还不能满足需要，资本家和把头就用各种卑鄙和野蛮的手法，到外县甚至外省去拐

骗穷人到矿区来做工。本省如云梦、安陆、孝感、黄陂、汉川、天门、随县、洪湖、沔阳等地，外省如湖南、河南等地，到处都有他们派出去的喽罗，为他们拐骗、贩人。老工人肖仁贵幼时就是他们从沔阳仙桃镇拐骗来的。

当资本家和把头用欺骗或暴力手段把穷人弄到膏洞后，就利用“师徒制”来牢牢地束缚工人。“师徒制”里的所谓“师”就是把头，所谓“徒”就是工人。“师徒制”规定，“徒弟”不经“师傅”的允许，不能自由行动，不能另找活路；徒弟的工资要扣去一大部分给“师傅”，“师傅”可以把“徒弟”借给或转卖给别的“师傅”。把头为了确保自己的专利，收“徒弟”时，自己先垫出钱来设席请客，喝工人的“拜师酒”，以此宣告他和某某工人建立了“师徒”关系，他人不容侵犯。这“拜师酒”就是工人的卖身契，它使工人成为把头的终身奴隶。“徒弟”如果逃跑，“师傅”就有“理由”利用资本家的武装“自卫队”或矿警把他们抓回来毒打。甚至“徒弟”的家长因为收容了逃回去的亲人，也要挨打。

工人陈家才，因为受不了洞下的折磨，偷偷地跑回了家。把头三疯子亲自带领儿子和两个矿警，荷枪实弹，到陈家才家要人。陈家才躲了，三疯子就把陈家才的父亲抓到洞上毒打一顿，限他第二天把陈家才送来，并恶狠狠地说：“你明天不送来，就不要怪三爷不留情面！”陈家才不忍全家受害，第二天只好又回到洞上。三疯子并不因此罢休，他把陈家才吊在栈房屋梁上，用鞭子毒打后又泼盐水。趁陈家才昏死过去的时候，三疯子使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送下洞去。这次一下洞里，陈家才被迫干了七十多天的活，出班时，把头一文

钱也不给他。把头还无耻地说：“这回就算他是坐洞牢！”这就是“师徒制”下的所谓“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工人们痛恨地说：“‘师徒制’，害穷人，上洞如同上鬼门，上了鬼门把身卖，‘阎王’天天来逼债！”

另外，资本家和把头还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奴役工人的目的。在每年腊月底，资本家通过把头趁工人过年时需用钱的机会，往往付给工人几个“酒钱”。工人接受了酒钱后，就得在来年继续在洞下为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干活。所以酒钱是工人的卖身钱。还有一个更毒辣的方法，就是拖欠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往往借口“石膏销路不好”、“售膏钱还没有收到”，一面拖欠工人的工资，一面以“过些日子再补发”为诱饵，迫使工人继续干活。

## 十 算不清的剥削账

一下应城走观音坡，  
观音坡望到应城是个“银钱窝”。  
下来吃“盘缠”，  
转去卖被窝。

这是在膏洞卖工的应山籍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谣。这就是说，当初工人从应山出发时带了“盘缠”和被窝，一路上满怀希望到应城。到了应城，“盘缠”用光了，当了一段时间的矿工后，实在干不下去了，想回家去，没有路费，不得不把被窝也卖了。这是指那些还能从膏洞脱身出来的工人而言。对于许多工人说来，膏洞是个鬼门关。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

的血腥统治下，一进去便出不来了。很多外地工人在黑暗的膏洞中折磨至死，葬身洞底，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了。

旧社会，在满目凄凉的矿区，膏洞工人在政治上遭受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和蹂躏，在经济上有一笔世代代算不清的剥削账。

膏洞工人的工资是十分微薄的。同时，资本家和把头在发放工资中又要尽了花招。洞下工人是以四十八小时为一班，工资按班计算。在抗日战争前夕，锤工的工资每班三串三百钱，合“银洋”五角左右。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个班八小时计算，当时，做八小时的工，还没有一角钱。拖工、抬工、天洞工的工资就更少，每班二串九百钱。地面上的工人如机工、棚工等的工资是按日计算的，除机器工人工资较高外，一般比洞下工人还要低，棚工每日只六百四十钱。

工人工资低，劳动重，时间长，资本家还不满足，还要按“钱码”发给，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剥削。因为那时期，湖北省钱票的贬值比洋票快得多。早期，膏洞交售石膏也用“钱码”计算，因此，工人工资按“钱码”计算还可说。但从二十年代后期起，膏洞交售石膏改用了“洋码”计算，而工人工资还沿用“钱码”，这又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个花招。

大家知道，“钱票”是只能进行交换的，它本身既不能顶吃，也不能顶穿，如果“钱票”贬值买不到东西，就等于一张废纸。特别是从一九三八年矿区沦陷后，直到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币制更加紊乱，通货膨胀加剧，工人所受货币“贬值”的痛苦就更大。老工人黄兴发，一九四七年死

了母亲，向把头借了二十四元“关金券”，把头给钱的时候，硬要把这笔钱折成稻谷六石记上账本。隔了一天，这二十四元纸币，只能买到一石一斗谷子。此后，黄兴发兄弟两人干了两年的活，把头一结账，工资分文没得，还欠一石七斗谷子。又是货币贬值的剥削，又是高利贷的剥削，真是“把头的算盘，老虎的口，吃人不吐骨头”。黄兴发这笔“账”一直到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才给他彻底勾销了。

资本家无孔不入，对工人的一点微薄工资也打尽了主意。他们欺骗工人，借口“石膏销路不好”，“卖膏钱还没有收到”，拖欠工资，而资本家转手又把工人的这些血汗钱拿去做生意，开店铺。工人出洞后没有钱用，把头就介绍工人向店铺赊账。你看，资本家就是这样奸滑、狠毒！他们残酷榨取工人的劳动力，攫取工人的劳动果实，还嫌不够，又用工人的血汗钱，开设店铺剥削工人！这象两条吸血的蚂蝗，缠在工人身上两头吸血，把工人的血汗全吸干了！许多工人一年干上头，吃不上穿不上，一无所有。有个姓余的工人，在洞下干了一年的活，到了寒冬腊月，没有棉衣，没有被子，冻得没有办法，只有跟狗和猫一起睡觉，后来长了冻疮，行动艰难。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严冬晚上，他躲在茅草堆旁的灶房里睡觉。深夜，灶火熄了，他也就活活地冻死了。

把头对工人的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膏洞上的大小把头，除了层层虚报工人名额，加重工人的劳动，侵吞空额工人的工资外，还大肆贪污工人的伙食费、草鞋费、碓衣费、工具费等十余种费用。根据老工人回忆，一对膏洞每月从把头克扣工人伙食费一项，在所有把头间按所包锤数分摊，每

包一把锤可分得大米八十斤，油十五斤。如果以整个膏洞六十四把锤计算，每月由把头克扣的大米达五千一百二十斤，油六百九十斤。还有资本家年终时诱惑工人的所谓“洒钱”，资本家规定发给的是十五元到二十元，而到工人名下最多四、五元。把头剥削工人真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所以工人愤怒地说：“资本家喝血，把头剥皮。”

## 十一 利润滚滚万骨枯

贪婪的资本家，从来不把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眼里。只要有钱可赚，资本家总是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活。出了事故，工人死了，资本家眼睛都不眨一下。工人受了伤，成了残废，不能干活了，资本家就把他一脚踢开，使工人在到处流浪中死去。工人愤怒地控诉道：“资本家把我们工人的命不当算！”

一九三九年，新斗半膏洞的总巷和矮巷间冒顶，拖膏的童工只有八人得救，其余的四十个童工全被砸死了。

一九四六年，资本家杨友吾不顾洞下冒顶的危险，派把头陈老四指挥工人在洞底打“天洞窝子”（堆存石膏的场所），顶板下塌，有五个工人被砸死，两个工人受重伤。

一九〇八年，北山新昌膏洞，因洞址选择不当，排水渠道没有搞好就强行开工，结果被河水淹了，死了四十三个工人。

最使老工人回想起来感到怒火万丈的，是膏洞因“穿水”而造成的惨剧。

松林岗膏洞“穿水”，淹死了三十多人！

大革命前有一年，狗齿林膏洞“穿水”，资本家张玉山不让工人出洞，砍断了吊车绳子，结果淹死了三百多名工人！工人们愤怒极了，不久，就把张玉山处死，报了这个血海深仇。

经常发生的“穿水”事故，完全是资本家一手制造的。因为当时在矿区熬盐很赚钱，如果有一个老洞的盐水冲到自己的膏洞里来时，就等于白花花的银子流到自己的口袋中来了。所以，贪婪的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膏洞巷道打到邻近有盐水的旧膏洞旁边，跟它打通，让它穿水。

一九一九年七月，北山坟头嘴膏洞已经开采到老洞沙田洞的旁边了，工人们看到了“穿水”的征兆，纷纷逃出洞外。但资本家韩清安为了夺取沙田洞的盐水，竟丧心病狂地指使把头带领矿警逼迫工人下洞继续干活。不多一会儿，洞下果然“穿水”了，黑心的资本家韩清安，不但不组织抢救，反而立即把洞口封闭。结果，八十三名工人全部淹死在洞里。这一笔血债矿工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抗日战争前有一年，如意冲膏洞也出现了“穿水”的征兆，工人们纷纷出洞躲避，这个膏洞的资本家跟坟头嘴膏洞的资本家韩清安一样，指使把头强迫工人再回到洞巷里去，并派矿警把洞口守着。工人下去后不久，洞里开始“穿水”，没有办法，工人被迫抢着上洞。有个姓康的工人，拚命用吊车上的绳子紧紧地缠住自己的两只手臂，让吊车吊上去，后来的工人为了上洞，抱住他的双脚，这样一个抱住一个，总共吊上来七个人。还有十几个工人来不及吊上来，水已灌满

了整个膏洞，活活被淹死！

这个姓康的工人上洞以后，两只手臂的骨头都被勒断了，丧失了劳动能力。狠毒的资本家看到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便一脚把他踢开。从此，这个残废了的工人讨饭流浪在矿区。两只手烂掉了，有饭都无法吃到口，更何况无饭可吃，怎么生活呢？工人弟兄看到这种凄惨情景都悲伤万分。他们帮助他用绳子在一个手膀上绑一个铁皮盒子，另一只手膀上绑一个饭匙，让他自己可以吃饭。可是饭从哪里来呢？穷苦的弟兄们都在挨饿。不久，他就含着悲愤和痛苦的心情死去了。老工人至今还能记起这个阶级弟兄的苦难形象。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流进资本家腰包的白花花的银元，就是矿工们的一具具尸骨！真是一家发财千人死，利润滚滚万骨枯！

## 十二 登上革命的舞台

应城膏盐矿区工人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剥削，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也表现得特别坚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矿区工人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野蛮迫害，曾经进行过许多的自发性斗争。除了几乎每日每时都存在的怠工和逃跑这种对抗以外，最突出的，是以暴力手段来回击反动统治。这不仅表现在痛打把头

的事件上，而且表现为群众性的武装暴动。历史上每当农民的反抗运动兴起的时候，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矿区工人就揭竿而起，同起义农民站在一道，英勇地投入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战争。

早在清朝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军猛烈发展，即将席卷湖北的时候，矿区工人和农民数百人，在陈七的领导下，奋起响应，占领了石膏集散地黄滩镇。他们惩办了那里的土豪和恶霸把头，封锁了交通要道，给应城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应城的地主、豪绅和矿商，趁太平军正集中兵力夺取武汉的时机，调集各乡团的地主武装，于十一月中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黄滩镇。矿区起义工农毫无惧色，扼守富水河西岸，英勇抗击。最后，由于太平天国的援军未到，寡不敌众，起义工农在向西南突围时，大部分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地主武装烧杀掳掠，血洗黄滩镇。起义者的家属一百多人，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全部惨遭杀害！

反革命的屠杀并不能阻止矿区工人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就在这次大屠杀之后的十年，即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九月，当捻军经过应城时，矿区不少工人又参加农民起义军，继续为推翻封建王朝而斗争。

矿区工人自发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矿工雷么领导的一次暴动。雷么原来是应山县的穷苦农民，为反抗地主的压榨，被迫离乡背井，来到矿区，充当抬工。他以为从此逃离了虎狼窝，那知到这里又进了地狱门。在那阴森的膏洞里，他度过了数不

清的黑暗岁月，受尽了监工的训斥，把头的鞭笞。有一次，还被“神父”抓到天主堂里毒打。这一切，教育了雷么，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除了斗争，没有穷人的出路。雷么秘密地串连了许么等一批工人，回到应山，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发动和组织近千的农民，举行起义。雷么率领的起义军，打州过县，严惩土豪，为民雪恨，开仓济贫。群众把他比作是为民伸冤的“青天”，把他看作是专打坏人的“雷公”，说：“天上有青天，地下有雷么。”雷么的队伍开进矿区前，在矿区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地方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雷么重申队伍纪律，强调说：“矿区都是我们的穷兄弟，大家不得瞎闹。”进入矿区后，雷么派人在穷苦农民和矿区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插上旗子，禁止队伍入内，真是做到对工农秋毫无犯。这支起义军，对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恶霸把头则坚决镇压，毫不留情。他们惩办了大地主熊大瞎子和大把头郭万财等一批吸血鬼，并抓走了矿区天主堂的梅神甫。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被抓走，吓昏了应城反动统治者。他们诚惶诚恐地派人谈判，愿出一万大洋赎取。反动统治者那里知道，金钱对革命的工农是不能发挥效能的。在起义工农愤怒的铁拳下，这个恶贯满盈的“神甫”见了上帝。但是，雷么的起义军，也正如过去多次的农民起义军一样，由于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终于失败了！

苦难的岁月，象大富水河一样，不断地流逝。终于在一九二一年，出现了胜利的曙光。无产阶级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创建了自己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从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矿区也开始有了党的活动。经过矿区党员的一段时期的发动工作，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带动下，一九二三年五月，矿区第一次出现了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全矿大罢工。

罢工是从党当时活动的中心地区北山肖家坟一带的工人首先发起的。矿工们采取有组织的大游行的方式，扩大罢工的影响。游行队伍每经过一个膏洞和盐厂，就停下来宣传演讲，号召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并以群众的压力迫使把头不敢进行阻拦。这样，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游人越多。不到一天，罢工怒火燃遍北山各膏洞、盐厂。膏洞停了车，盐厂熄了火，整个北山矿区罢工了，成百上千的工人聚集在王家庙开会。这时，膏洞资本家慌了手脚，调集百余名“商团”武装包围会场。工人镇定自若，继续开会。资本家见威胁无效，就命令“商团”开枪射击，工人喻么当场被打死。矿工们义愤填膺，冲出会场，立即整队向中山、下山游行，揭露和控诉资本家的罪行。很快，三山上万名工人开始了总罢工。由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持斗争，资本家被迫同意了工人所提出的条件，增加了工资。如坡面上工人的工资由每日两百钱增至两百九十钱。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罢工，不仅使工人在生活上稍有改善，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坚强的组织，有组织地进行斗争。在罢工胜利以后不久，党在工人

中发展了邓先柱等一批党员，并在工人中分期分批地建立起秘密的学习小组。每组由三人组成，每个组员除在组内学习外，又另外串连两人组成新的小组，并领导该组的学习。这样，逐渐向下串连，形成一个宝塔式的、组织严密的群众学习网。党通过这个学习网来布置工作，并用苏联十月革命的实例教育工人，使工人明确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解放全人类，才能赢得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

一九二六年春，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矿区进入公开活动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矿区相继成立了机工会、棚工会、锤工会，膏盐搬运工人也成立了驮运工会、民船工会等。工会负责人大多数是从工人中培养的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党派到矿区工作的党员，则担任各工会的党代表。以后，在各个分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矿区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应城总工会。

秋天，北伐军进入应城。党通过工会不失时机组织起各种工人武装队。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拥有一百多条枪，纠察队员都是由各膏洞、盐厂挑出来的积极分子。需要时，工会一声号令，工人拿起锤把、扁担，立即就可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群众武装。有一次，总工会就从棚工会中调了一百名青年，扛着一百条扁担，进城“打铺家”，把那些躲在县城里的一些吸血鬼，打得满地滚爬。工人的武装力量，使乡间的那些土豪劣绅，使县城的那些反动资本家，使矿洞上的那些恶霸把头，听了打颤，见了叩头。由于工人起来形势甚猛，资本家的“商团”，有的投靠工会，有的消声匿迹，再也

不敢耀武扬威了。

工人建立起工会，有了自己的武装之后，最主要的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反动统治者的威风打下去，把自己的权力树起来。工会经常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吴佩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把头！”等战斗口号，响彻矿区上空，给反动统治者以很大的压力。北山工会还在陡河坡祖师庙搭起台子，斗争恶霸地主。工人对那些作恶多端的或不听工会指挥的反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则戴上绿帽子牵着游乡。有个绰号叫“李猴子”的大把头，反对工人停工开会，工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捆起来，戴上高帽子，牵到会场受教育。工人提出增加工资，资方代表韩顺安来谈判毫无诚意，百般拖延，工人一气之下，给了他一巴掌，戴上高帽子，拉出去游街。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县太爷，也曾被弄得颜面扫地。有一次，应城县知事到矿区来调解纠纷，坐着轿子，前呼后拥，象过去一样向工人耍威风。工人气愤不过，一拥上前，砸烂轿子，指着知事的鼻子教训了一顿。从前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奴隶，在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

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工人的经济生活也有所改善。各个工种的工资都提高了，一般的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封建把头再也不敢层层克扣。奴役工人的各种陈规旧习，迫害工人的各种严法酷刑，一扫而空。

觉悟了的工人为了摆脱精神的奴役，纷纷起来打“洞神”，砸菩萨，把庙宇改作工会办事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天主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党的倡导下，矿区各地都成立了妇女协会，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缠足，鼓励妇女参加政治活动。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矿区沸腾起来了，过去蕴藏在地下的革命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象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了。

### 十三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势如暴风骤雨的工农革命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帝国主义的墙脚，专制政治的基础封建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望风披靡，完成着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党中央的领导一再被机会主义分子篡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葬送了，接着又使革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矿区工人运动也随之连续受到挫折。矿区工人在大革命期间所夺得的一切权力被剥夺，随着黑暗时代的重临，矿区工人又被打入地狱，在阴森的膏洞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但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工人，是不会低下头来做驯服的奴隶的。他们尽管处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也仍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当工人忍无可忍时，经常奋起反抗，痛打把头，但结果往往遭到残酷的迫害。为了避免把头报复，以后他们采取东井和西井工人互相支援的办法，就是说，如果东井的工人要惩罚某一个把头时，就请西井工人过来执行。惩

罚的办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毒打工人的把头，就让他尝尝拳头的厉害，恶毒咒骂工人的把头，为了让他以后嘴里“干净”一些，就往他嘴里塞点大粪，工人称之为“大粪刷牙”。由于把头认不得这些工人，挨了打，吃了大粪，也无可奈何。有的工人还巧妙地采用“先礼后兵”或“引而不发”的方式，让把头“清醒”一下头脑。在一个绰号叫“毛脚板”的把头门上，就出现过这样的“通谍”：“毛脚板，你真坏，打骂工人太不该，今后如果还不改，小心你的狗脑袋。”

工资问题当然也是工人所关心的。这个时期曾出现过几次小规模 的罢工斗争，结果虽然增加了一些工资，但和上涨的物价相比，实际上工资反而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把 头对工人工资的克扣就显得更加突出，因而经常出现反把头克扣工资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正月间，一个随县来卖生姜的农民，被把头骗进洞里，强迫劳动到腊月底，停工时才让他上洞来。这个连续劳动了近一年的农民上洞后，把头见他是外乡人，在这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就下了狠心，干脆赖账，一个工资也不给。坡面上的制盐工人看到这种情形，气愤不平，将把头捆起来，强迫他吐出了侵吞的工资。这个农民非常感动，说：“把头坏透了，只有我们工农才是一家人哪！”

承包供应工人米和菜的商业资本家也是工人斗争的对象。商业资本家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总是送最坏的米，最差的菜。制盐工人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有时为了警告这些商业资本家，就将他们的米袋戳穿，菜篮砸烂，有时也能迫使他们换另一种米和菜来。这种斗争所以能

够收到一些成效，还由于工人利用了把头和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把头克扣了工人的伙食费，如果商业资本家送来的米和菜稍好一点，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剥削工人的罪行。

这一类经常发生的零星斗争事迹，不仅体现了矿区工人一贯具有的坚强的斗争精神，而且显出了受过党的教育的矿区工人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以及在斗争策略上的显著提高。当然，这些斗争只能使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暂时减轻或稍微缓和，而不能根本摆脱压迫和剥削。但是，他们通过这些斗争积聚着力量，等待着有一天党将他们引上为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大道。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从此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就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矿区工人运动也就从曲折的道路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 十四 组织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迫宣布对日抗战。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一九三七年秋，中国共产党应城中心区委成立（不久改为应城县委，后又合并为京应县委）。从一九三二年以后，就与党失掉联系的矿区党员，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应城中心区委在清理了矿区党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北山建立起党支部，在中山、下山建立起党的小组，矿区成立了由邓先柱等同志组成的党的区委。

矿区党组织成立后，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争取民主，争取工人生活待遇的改善，以及深入地进行抗日政治动员，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同时积极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为实现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斗争。

民众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建立工会，把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是动员广大工人投入抗日战争的必要前提。在党不公开的情况下，矿区党与群众的联系和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也主要是通过工会这个纽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工会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民党虽然宣布了对日抗战，也有允许成立工会的一纸空文，但实际上仍然坚持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当时，矿区党领导工人组织工会，矿区反动的资本家和恶霸把头勾结国民党应城县府，强加阻止。经工人们多次交涉和斗争后，只答应可以成立锤工会、机工会、铁业工会、钻井工会、吸水工会，而不许成立棚工会。为什么呢？棚工人多，有五六千人，斗争性最强，反动资本家和恶霸把头，都尝过他们的拳头的厉害。要是让棚工组织起来，那不好对付。于是，棚工们就带着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的所谓工会组织《条例》去“告状”，他

们向伪县府官员、反动资本家、恶霸把头们提出质问：“《条例》规定：五十名以上的工人团体可以成立工会。我们有五六千人，为什么不能成立工会？”“你们不同意，我们也要成立。”这《条例》本来是反动政府装点“民主”的一纸空文，并不准备实行的。这些家伙不曾料到工人们会搬出它来，因此，一个个被问得目瞪口呆。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他们只好答应成立棚工会，但规定要由大资本家郭培生担任“指导员”。这个家伙，是棚工们的“老交往”，让他挂个头衔，量他也不敢在棚工们面前“指导”。因此，棚工们也就同意了。这样，大革命失败后被取缔了的各种工会，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工会的牌子，高高地挂在坝子上。大家欢乐地唱了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  
组织起来力量大。  
拿起刀，扛起枪，  
打败日寇保国家！

## 十五 敌后短枪队

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地相继沦陷。一九三八年十月，应城也被日本法西斯占领。

应城，位于汉宜公路上，濒临富水，是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膏盐矿区是这个要地上的一块肥肉。日寇为了掠夺我地下资源，并企图从经济上封锁我新四军在鄂中的根据地，在占领应城以后，很快就把矿区划为应城的重点防区。在这

个方圆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岗哨林立，据点达三、四十个。其中，直接由日本鬼子亲自驻守的据点就有七个。鬼子、汉奸、国特、地头蛇在矿山横行无忌。

毛主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矿区党和人民珍惜祖国大好河山的一草一木，在鄂中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利用国民党溃兵丢下的枪枝，建立短小精悍的抗日武装，积极打击敌人，决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

一九四〇年，矿区“短枪队”在雷家冲正式成立。短枪队员都是矿工出身，在矿山是工人打扮，跟工人一起做工，在田间穿农民衣服，跟农民一起种地。他们英勇斗争，有力地保护了工农群众，工农群众也极力掩护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支“短枪队”进攻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斗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使敌人抓不着，打不上，而敌人却日夜挨打，处处毙命。

有一次，一小队日本鬼子在宋河到应城的公路上进行骚扰活动，短枪队闻讯后，踹过富水，飞兵直插盛滩镇。鬼子在那里做好饭，刚刚在吴家稻场蹲下来准备吃哩，忽然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一个个横尸稻场。

一九四二年，丁家岗茶馆，也是个赌场，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座上客”，姓张，外号叫“一撮毛”。这个家伙是一个铁杆汉奸，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短枪队决定干掉他。这一天，短枪队员们把手枪掖在腰间，来到丁家岗茶馆。开始，短枪队还不认识他，名字和人没有对上号。于是，

短枪队长就机智地喊了一声：“张先生，你还差我的钱哩！”试探谁来应声。一撮毛傲慢地说：“我姓张的从来不差别人的钱！”说话间，又有人喊叫“一撮毛”摇宝。这样，短枪队便认准了这个作恶多端的狗汉奸。进入赌场后，他“摇宝”，大叫大嚷：“双上统统卖了。”短枪队队长坐在他的对面，就是要“找他的生意做”，满口答应：“都买了。”一揭宝，一撮毛赢了，连声叫喊：“赔钱！赔钱！”于是，短枪队长就伸手向腰包里掏，但是，不是掏钱，而是在掏枪。一眨眼工夫，当人们还来不及看清楚的时候，短枪队长便“砰”的一枪，照一撮毛“顶门心”打去，一撮毛一下子倒在桌子下，赌场一轰而散，短枪队也迅速离开茶馆，转移了。

还有一次，腊月三十的晚上，这是人们最讲禁忌的时刻。国民党的一个副官蔡洪斌回来了，与我们争夺矿区，这个家伙是一个破坏抗日收款的狗汉奸。短枪队知道后，决定趁过年的时候把他收拾掉。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短枪队员，趁他全家出“天行”时，顺着墙壁都溜进去了。等他全家出完“天行”回屋，把门关好后，看见屋里坐着好几个生人，不觉惊叫起来。

他母亲劈头就问：“哪里来的？搞么事？”

短枪队员们回答说：“会蔡先生的。”

她母亲扯谎说：“蔡先生不在家。”

“对不起，在家，回来了，我们是岗楼上的。”短枪队长机智地说。

正说话间，蔡洪斌从内房出来了，短枪队长问：“蔡先生，认识我们吗？”

姓蔡的感到有些不妙，一边回答说：“不认识，不认识！”一边就往门外退，准备逃跑。短枪队长抢上几步，拦在门口，平静地说：“慢走，我们是短枪队！”蔡洪斌一听，吓得直磕头，他老婆忙拿出一盘大洋来。一个短枪队员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人。”话音未落，一声枪响，短枪队把蔡洪斌打倒在堂屋里，结果了一个汉奸的狗命。

团山，处于交通要道，地势很高，可以俯视矿区北山和中山。日寇计划在山上庙内建立据点，当日寇刚打好灶，还没来得及进驻时，短枪队挑起两担柴油，摸黑上去，放起一把大火，把这个庙烧得个精光。烧庙时，短枪队对庙内的和尚讲清了道理，说明了敌人在这里安据点的危害，并协助和尚们搬出了自己的财物，以后又对他们的住处作了妥善的安排。和尚们感激得连声祝福：“阿弥陀佛，百战百胜。”

对于敌人已经建立的据点，短枪队乘敌人戒备稍疏时，就进行偷袭。陡河坡的敌人营房就是被短枪队潜入烧毁的。同时，短枪队还经常袭击零星出外之敌，使敌人不得不困守据点。初期，据点里的敌人经常三三两两大摇大摆地闯进村子里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短枪队开展袭击活动后，多次歼灭了这些匪徒，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寨，这就保障了群众的安全，密切了短枪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敌人受到短枪队神出鬼没的袭击后，总是妄想消灭这支队伍。为了刺探短枪队的行踪，他们经常派人化装到矿区侦察，但由于广大群众警惕性高并与短枪队密切配合，这些化装的敌人往往被很快发现而为短枪队所俘获或击毙。有一次，日本侦察队长带了一个翻译，化装到坝子上活动，群众

识破后，报告短枪队把日本侦察队长逮捕处死了。在群众的帮助下，短枪队还在西山龙王集的一个茶馆里活捉一个日寇密探。

由于短枪队配合主力部队坚决地打击了最反动的敌人，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促进了伪军的分化，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逐渐转到中立的立场上来。

有一次，在潘家集，一个姓朱的伪军班长，带领一班人夜里查线，碰见了短枪队，姓朱的就喊话：“哪一部分的？”对方回话说：“四老板！”四老板是当时伪军对新四军的畏称，伪军听后连连说：“我们让路，我们让路……”短枪队长教训他们说：“叫你们夜晚少出来些，免得惹些麻烦，你们总是跑出来。”伪军朱班长急忙解释：“不出来不行，鬼子要我们出来。”

一九四二年冬天，一个伪军连长带着一排人窜犯矿区，驻扎在矿区裕洪乡一个工人的家里，门口放了两个哨，只准进不准出。这个工人当晚就把墙壁挖了一个洞，偷跑出来给短枪队送信。短枪队马上找来伪乡长陈振华，问他是当真汉奸还是当假汉奸。陈振华连声说：“当假汉奸，当假汉奸。”短枪队长说：“那就交给你一个任务，把窜入我们矿区的一股伪军消灭掉。”伪乡长陈振华不敢怠慢，回去后马上带了几十个人，来个突然袭击，把汉奸队伍消灭了一半，剩下的人也都丢下枪逃跑了。

在矿区武装斗争中，短枪队不仅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而且还要配合主力部队击退国民党特务武装的进攻。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日寇游而不

击，对群众大肆抢劫。群众对这伙盗匪十分愤恨，称他们是“刮皮队”、“倒坛队”，说他们是除了尿布什么都要的“清箱队”。这伙盗匪对矿区这块肥肉一直是垂涎欲滴的。排除他们进入矿区抢劫、派款、勒索，也是一场极其尖锐的斗争。国民党李又唐匪部，仗着他枪多势大，在矿区横行霸道，强行派款，骚扰群众，破坏抗日。一九三九年，新四军挺进支队为了保护群众，推动抗日，在矿区短枪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缴枪三千余支，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不久，国民党五战区许友祥匪部，派了一百多人的所谓“游击中队”窜犯矿区，妄图筹建伪工会。短枪队经过周密的研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杀死了许友祥的“游击中队”队长高云鹤，粉碎了他们企图挤进矿区的阴谋。还有国民党随县县长、矿商郭和记老板郭培生，勾结混入矿区工会的叛徒易香庭，挤进矿区，派款勒索。短枪队在广大工人的配合下，烧毁了郭和记盐棚，枪毙了叛徒易香庭，吓得郭培生连夜溜回了随县。国民党专员曹勛曾派一个姓林的参谋长来矿区要款，被短枪队逮捕，押解出境。这些斗争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伪顽，而且有力地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矿区党在主力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并领导短枪队这支工人自己的武装，与敌伪顽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终于将矿区这个敌人严密统治的地区，变为我党的游击区，并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建立起民选的区抗日政权。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随着工人武装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及其在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节节胜利，党所领导的工会威信空前提高，成为矿区的实际主宰者。不仅矿区敌伪组织的号令不行，而且资本家和把头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横行霸道。膏洞和盐棚开工时，资本家任用那个把头，把头任用那些工人，都必须取得工会同意。过去，每到冬天盐棚停产时，把头往往留用亲信，乘机裁减“调皮”工人，现在则必须按照工会所开列的名单，优先照顾无家可归的老工人。毒打工人的事几乎完全绝迹，强迫工人成年累月在膏洞下劳动而不定期换班也是不许可的。工人生活也稍有改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并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半斤肉，半壶酒，每月理发两次。各工种的工资都有所增加，过年时增发一个月的工资。一九四二年，日寇火烧盐厂，大批工人失业，工会向新四军请款救济，以后又在武装保护下，组织工人“偷盐”，以解决生活困难。这一切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人抗日的积极性，并且使工人看到了自己掌握一定权力后所取得的成就，从而自觉地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新中国的前途密切联系起来。

## 十六 反封锁斗争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和全部伪军，疯狂地进攻我根据地。鄂中根据地，也象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在军事、经济等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应城矿区是鄂中抗日武装和鄂中根据地人

民食盐的供给地，征收盐商抗日“乐捐”又是鄂中抗日武装经费的重要来源。因此，日寇为了切断我鄂中根据地的食盐来源和经济供给，以达到围攻我根据地的目的，对矿区的食盐生产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和疯狂的掠夺。

日寇开始在矿区盐厂附近的高地上，建筑碉堡，派出鬼子和伪军共同驻守，日夜巡逻；按盐厂大小，每个盐厂派去十至十五个伪军，进行严密监视；收买汉奸、特务，密查缉访。但随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敌人实际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因而这套办法也日益失灵。

一九四二年，日寇采取了更毒辣的一套办法。首先，将全矿区一百零八个盐厂，除留下八个厂继续熬盐外，其余的全部烧毁。对留下的盐厂，派重兵把守，严密监督。用减缩生产单位，集中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控制，这反映日寇已走入穷途末路。其次，日寇利用汉奸，组织伪制盐部，实行食盐封锁政策，并依靠伪组织，对矿区和附近人民，实行食盐配给制，要群众凭“良民证”向伪保长（群众称“盐保长”）购盐。与此同时，日寇还丧心病狂地采用各种骇人听闻的野蛮刑法来处置“偷”盐、运盐的人。一种是“拌豆腐”，即装进麻袋，用乱刀刺死；另一种是“灌盐水”，即用橡皮管子插到嘴里打盐水，直到肚子灌得象鼓一样，然后鬼子站上去乱踩乱踢，嘻笑作乐，一直糟踏至死。此外，就是活埋，即把人捆起来扔进废膏井。有两口三、四十丈深的马墙角井和嘴台井，就填满了死难同胞的尸首。矿区林家榜小湾，一个农民从废矿碴中刮盐土，被发现后，日寇烧毁了全湾二十九户人家。矿

区内的工农群众，单是以所谓“偷”盐水的罪名而被鬼子杀害的就有三百余人！真是凶残到了极点！

日寇的“三光”政策，只能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使抗日的烈火越烧越旺。日寇的暴行，丝毫不能动摇矿区工人支援新四军，支援根据地的决心。不管敌人统治多么严密，矿区工人在应城市委和矿区区委的领导下，向敌人展开了反围攻、反封锁、反迫害、反掠夺的尖锐斗争。

首先是以封锁对封锁。敌人封锁我根据地的食盐供给，我们就封锁运往敌军的粮食、烧柴等等。开始，一方面发动了矿区和矿区附近的广大工农群众，凡运往敌军的粮食和烧柴，一一没收；另一方面，我游击队经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破坏敌人的运输。

其次是争取、分化和瓦解驻盐厂伪军。这些伪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发“洋财”，“占便宜”。我们就抓住他们的这个弱点，进行工作。一天，伪军小队长陈黑子，借口说他的“亲戚”没有盐吃，要一个工人给他搞点盐，矿区工会知道后，就叫那个工人答应了他。当官的一带头，伪军士兵也就跟着学，这个跑来找工人诉苦说：“我家里有几个月没有尝过盐味了，你跟我搞个五斤、十斤。”那个跑来对工人说：“唉！当兵的待遇低，生活苦，调到矿区驻防，什么也捞不着，穷得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言外之意，也是想搞点盐，做点黑买卖。对于他们的要求，一一都满足了。这样一来，伪军与工人渐渐混熟了，工人们就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爱国觉悟。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伪军内部开始分化，有的就开了

小差。如驻扎在陡河的伪军，那时就跑了不少。伪军县大队发现这个情况后，将该处伪军大部调回县城整训。我短枪队乘机赶到陡河进行袭击，并发动附近工农群众，将伪军的营房烧毁，炮楼砸烂，把伪制盐部的两个汉奸处死。这对敌伪军的震动很大。通过这样一拉一打，很多伪军变成了“两面派”，明里是给鬼子做事，暗地里还给我们帮点小忙，工人有事找他们，也比以前好说话了。

争取、分化、瓦解伪军的成功，为反食盐封锁斗争扫除了第一道障碍。在矿区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工人们为着给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送盐，想出了很多办法。首先是要把盐弄到手。敌人对于各盐厂食盐生产的监视非常严密，为了防备工人“偷”盐，规定各盐厂的食盐要随制随交。怎么办呢？工人们就根据把头白天监视严，夜晚监视松的情况，做夜班时偷偷把一部分盐埋起来。要使敌人在过称时发现不了破绽，就必须使夜班出的盐比日班多，做到“偷盐”不减产。于是，工人创造了一套办法：白天烧淡卤水，晚上烧浓卤水；白天小火烧，晚上大火烧。这样做，夜班比日班甚至可以多产三分之一的盐，因而有时每天可以匀出上千斤的盐埋藏起来，然后伺机运出。

“偷”盐是一场紧张的斗争，运盐更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要将大批贮藏的盐运出去而不被敌人发现，或者在敌人发现后，仍然保证任务的完成和矿工们的生命安全，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矿区党十分重视运盐的斗争，每次都是由负责人亲自动员，周密布置，调短枪队掩护，并通知正规部队接应。

一九四二年六月，盐厂工人积累了一万多斤盐，矿区总工会主席邓先柱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这批食盐运往根据地。

这是一个深夜。月牙儿高挂天空，被一片薄薄的云层遮蔽着，四野灰蒙蒙的。除隐约的听到附近资本家、把头的住处发出来的抹牌、掷骰声，四野一片静寂，鬼子、伪军大都进入了梦乡。这正是“偷”运食盐的好机会。由矿区总工会挑选的一百三十个身强力壮的工人，怀着战斗的心情，挑着一担担食盐，由短枪队护送，先是分散巧妙地绕过盐厂附近的岗哨，然后拉成一线，急速地朝石板河方向走去。眼看前面就要通过潘家集碉堡了，这是敌人封锁矿区的一道最重要的关口，由鬼子亲自驻守着。这时，短枪队二十多人迅速地分散开来，选好地形，埋伏在碉堡的四周，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工人们一个个挑着盐担，如箭一般，绕过碉堡。队伍还没有过完，被岗哨里的鬼子发现：“什么的干活？站住！”话刚出口，“叭公”一枪朝工人打来。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行动！短枪队紧跟着“叭叭叭”开始还击，密集的子彈，打在碉堡枪眼附近的砖壁上，碎石乱飞。敌人被压缩在“乌龟壳”里不敢伸出头来，又搞不清楚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无目标地乱放枪。于是工人们敏捷地越过敌人的碉堡，冲出敌人的射击圈。这时，根据地的接应部队也赶来了，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根据地部队和短枪队会合后，分兵三路，一路作掩护，两路阻击敌人，运盐队安全地飞速前进。

一线曙光，划破了沉沉的黑夜。这时，一百三十名革命工人已一口气把盐从潘家集挑到了相隔六十余里的京山石板

河根据地。大伙喜气洋洋地放下一担担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食盐，迎着旭日的光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又一次显示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寇的封锁和“围剿”，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壮大。一九四五年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鼓舞下，我军各条战线纷纷出击，全国处在对日寇举行大反攻的前夕。八月九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伟大号召。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矿沸腾。为了促使敌伪缴械投降，工人拿起锤把，扛起扁担，直奔各个碉堡、岗楼，吓得日伪军仓惶夺路，奔回应城。被日寇铁蹄践踏了近七年的矿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 十七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矿区阴云密布，一场新的更加激烈、更加艰苦的战斗开始了。

蒋介石在“和平”烟幕的掩盖下，由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把他的几十万军队，从大后方运到解放区。一九四六年春，我鄂、豫两省解放区的周围已麇集着国民党的二十几个师。在这种形势下，矿区的坚强屏障，驻扎在京应地区的解放军主动作战略转移，向北撤走。矿区成了国民党的兵营，这里驻扎有敌五十二师的一部和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他们是国民党对矿区进行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此外，按照国民

党的所谓“加强自卫组织”的命令，资本家的“同业公会”建立了一个“矿警大队”。每个资本家又在自己的矿上增设“自卫队”，大的膏洞或大的盐厂三、四十人，小的也有七、八人。每个“自卫队”都配有步枪、手枪和一至两挺机枪。国民党给这些“自卫组织”规定的任务，是所谓“机动剿匪”，而以“配合国家及保安部队作战为主”。所以，这种“自卫组织”和抗日战争以前的“商团”相比，不仅在规模上大得多，而且在性质上也更加反动。它除了继续扮演资本家的看门狗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充当国民党用来对付我党和我军的警犬。

随着刺刀而来的，是扩充国民党，密布特务网。国民党应城县的“党政工作联席会议”曾经多次讨论过在矿区加强反动统治的问题，一九四六年春的一次会上作出了“矿区职工首一律征求入党”的决议。这次会后，他们将矿区“工首”（即把头）集中到应城寿林寺集训。通过集训，一次就发展了三十四名国民党员，加上原已参加国民党的把头、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矿区的国民党一下就扩充到百人以上。反动的三青团也同样在矿区大肆扩充。反动派通过这些组织大搞特务活动。例如，矿区三青团组织曾按照其上级发下来的“调查表”，“切实查填”了一份所谓“应城矿区潜伏奸匪详细花名册”，上报“武汉行辕管训所”，以便“依册提训”。这个黑名单不仅列入我部分党员，而且包括部分群众。此外，还有一批国民党驻矿“外勤干事”、工会“指导员”等等，更是公开地从事特务活动。整个矿区已和膏洞里一样，成了暗无天日的阴森地狱。

国民党统治工人的另一个庞大机构，是从上到下的各级

反动工会。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就以所谓“有敌伪参加或主持组织”的罪名，宣布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的工会“已失效用”，并提出按“切实掌握增强本党力量”的原则来“改组”工会。由于我党领导的工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时不敢贸然下手。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当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加强后，才把“改组”计划付诸实施。但是，从伪工会成立的第一天起，广大工人就不断地予以抵制。以伪棚工会为例，棚工几千人，参加成立大会和投票的仅三十余人。主持会议者最后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今天这次会议为奉令改组选举大会，事关重要，因天气稍有天湿（编者按：此句有语病，原文如此），缺席人很多，下次不得有此情形。”这真是伪钦定工会成立大会的绝妙写照！为了改变这种空头工会的难堪局面，应城县伪政府规定“强制入会”，提出各矿不得留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工人抵制伪工会的斗争。直到一九四八年初，据伪棚工会理事长郭白朋对国民党县党部的密报，还有不少工人“不依法来会登记”，他要求国民党派“指导员”“下会组训”，对工人“严加管理”。

国民党和反动资本家如此费尽心机地经营“工会”，显然是有险恶用意的。这点，从冠冕堂皇的“工会章程”中也可以看出。如伪棚工会章程规定：“本会会员应绝对遵守作息时间，不得无故有怠工或罢工之情事”，“会员个人不得无故向资方要求，致滋纠纷”等等。一句话，“工会会员”必须当资本家的驯服的奴隶。不仅如此，伪工会的任务，第一条是“关于政府指导机关特飭交办执行事项”，第二条则是“关于工会会

员之调查登记事项”。说得明白点，就是搞特务活动。例如，一九四六年六月，应城国民党书记长在一个“外勤干事”所写的关于张国玉和其他短枪队员活动情况的秘密报告上，就作了如下的批示：“特飭矿工会理事长韩绍泉、铁业工会理事长何顺兴查竣后核办。”这就是所谓“关于政府指导机关特 飭 交办执行事项”和“调查事项”。

以干特务勾当为宗旨的这种“工会”，当然需要“切实增强本党力量”。工会负责人几乎无一不是国民党党员、反动分子。如伪矿工会理事长韩绍泉，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区分部书记，从上面应城国民党书记长的那个批示足以证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这个家伙到矿区“巡视”时，坐着轿子，保镖卫士，手提短枪，前呼后拥，要工人称他“三爷”。这那里是什么“工会”负责人，完完全全是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太上皇！这个矿工会的其余所谓“八大常委”，清一色的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毫无例外的都是喝工人血的封建把头。这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家伙，这些矿区工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就是国民党在矿区赖以建立统治的社会基础。

就这样，国民党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通过军、警、特、“工会”等各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反动统治后，立即撕下了那层薄薄的“和平”面纱，操起屠刀，向革命猛扑过来。矿区一大批工人被捕，张福元等优秀工人被枪杀，雪白晶莹的石膏上，洒下了烈士们殷红的鲜血！但是，国民党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广大矿区工人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坚持斗争。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武装斗争暂时停息了，但是，罢工斗争却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反革命内战，滥发钞票，物价一日数涨。这种反动的经济政策，严重束缚了膏盐生产的发展，使工人生活更加恶化。这段时期，开工的膏洞虽有增加，最多时曾达八对，但每对洞的产量低落，全区年产膏仅二万五千吨，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三分之一。被日寇烧毁的盐厂，虽然逐渐恢复，但直到解放时，比抗日战争前还差三分之一。资本家为了弥补生产缩小所带来的“损失”，极力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同时，资本家又把通货膨胀所受的“损失”，尽量转嫁到工人身上。因此，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苦。据一个老工人揭发，有段时期他在洞下干了四十八天，只吃过一餐干饭。至于工资，更是微乎其微。干活好多天，领到一大叠钞票，还不够买一包香烟。事实进一步教育了工人，只有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进行斗争，才能生存。

一九四六年二月旧历年前的一次全矿大罢工，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矿区工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序幕。罢工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家依仗着卷土重来的国民党的势力，废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工人争得的一项待遇：过年时资本家应增发一个月工资作为工人的安家费。当时，县委委员邓先柱同志，这个在矿区出生入死地战斗了二十余年的老党员，虽然已经病重垂危，但是仍焦虑着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在病床上亲自指挥战斗。罢工前，工人代表与资方代表进行两次谈判，有国民党撑腰的资本家态度十分强硬，说什么“没有国民党的通知，不发安家费”。工人闻讯，万分气愤，一致要求罢

工。邓先柱同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叫人通知各膏洞盐棚按规定时间同时停工。罢工两天后，资本家找工人代表谈判。会上，工人义正词严地指责资本家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指出：“膏洞，是工人劳动开的，矿区，是工人流血牺牲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并警告资本家：“不要把国民党的腿抱紧了，眼光要放远点。”这时，聚集在会场外的数千工人，象决堤的洪流一样冲入会场，高呼口号，质问资本家：“为什么要废除过去发安家费的惯例？是谁给你们撑的腰？”资本家满头大汗，支支吾吾，最后不得不答应复工条件，发放了安家费。通过罢工，使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必须推翻资本家、把头的总后台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虽然矿区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党员都已转移到外地，但是仍然留有少数党员在矿区坚持斗争。他们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成功地组织了多次罢工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例如，一九四六年冬天，福利井工人的罢工斗争，就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

事前，两个工人党员在矿上进行了串连、发动，然后，于冬月初二在黄洞大堰堤凹子里召集了二百多轮休工人和坡面工人开会，研究如何开展罢工，并讨论了罢工要求，确定：（一）增加工资，并用实物折算固定下来；（二）恢复抗日战争时期的惯例，每月理发两次，打牙祭两次，每次酒肉各半斤；（三）积欠工人的存饷，限五天还清；（四）保证工人生命安全，不准穿老洞。会后，又召集洞下四百多工人开会，确定立即罢工。

罢工坚持三天后，大封建把头万双生麻子和大监工叶友

保带着狗腿子下到洞底，妄图强制工人复工。埋伏在巷道里的工人，一声暗号，吹熄油灯，操起锤把，蜂拥而出，把万双生麻子和叶友保围困起来，拳打脚踢。这两个家伙吓得魂飞魄散，昔日威风一扫而光，战战兢兢跪在地上求饶：“兄弟们饶了我吧！有什么话好说，好说！”工人提出会上确定的那四点要求，万双生连连说：“保证做到，保证做到。”叶友保补充说：“如有失言，天诛地灭。”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封建把头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国民党应城县党部为了对付矿区连续不断的罢工斗争，于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根据蒋介石颁布的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伪武汉行辕关于“为制止工潮尤须注意根绝奸伪分子煽动之阴谋”的通知，连续制定了两个秘密的所谓《防止工潮办法》。一方面指使工会加强特务活动，“随时注意考察各工会会员，尤其是新入会会员之生活及其言论与行动”，特别是对“活动能力较强”者要“切实注意其言行”，另一方面要特务机关注意找混入工人中的败类作为“内线情报人员”，当其“有贡献”时，应给予“精神或物质之慰勉”。国民党这套阴险毒辣的办法，并没有收到它预期的效果。罢工斗争不仅没有停息，而且，以后党还组织了一次有上万人参加的全矿区的大罢工。

## 十八 红旗插上应城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下，从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主力部队挥戈南下，

打进了国民党统治区。

一九四七年底，解放军到达距矿区八十里的宋河一带。为了弄清确实情况，一个工人到宋河去了一趟，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意外地遇见了一年多以前撤走的矿区总工会主席、短枪队指导员张国玉同志。全矿区立即传开了：“解放军来了！张国玉同志回来了！”工人们喜得不得了：有后台了，天又亮了！果然，不几天，张国玉同志带着二十几个同志回来了，埋藏的枪枝取了出来，矿区又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了！

武装队一成立，第一仗就打得很漂亮，一九四八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潘家集矿上工人的配合下，武装队成功地偷袭了资本家廖益记的夹堰堤膏润“自卫队”，缴获了两挺机枪和三十余支长短枪。在广大工人的支持下，没有多久，武装队就发展到一百多人。整个矿区又沸腾起来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矿区武装队按照江汉独立旅的作战意图，到应城城郊骚扰敌军，成功地将敌五十二师的一个团引诱进矿区龙王集一带的伏击圈，经过两天的激战，解放军全歼这个团，并打垮了敌五十二师的援军，直逼应城。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加上武装队采取了打上、拉下、争取中间的区别对待的正确策略，因而大多数“自卫队”、“保安队”已不敢与我为敌，这样就削弱了敌人的统治，打开了活动的天地。尽管敌五十二师受重创后，国民党又派来了第七师，并在矿区增设了一支行动队，有时还派大部队来“围剿”，但仍然无法对付这支工人武装队。

一九四八年十月，矿区武装队再次配合解放军，第二次

攻打应城。解放军英勇善战，从南门强行攻入，占领了应城，俘虏敌军三千二百多人。一星期后，解放军主动撤离应城，矿区工人和城郊农民迅速地拆毁城墙，使国民党重占应城后，防守上遇到极大的困难。

解放大军的进入应城地区，激起了矿区工人的一股参军热潮。在这期间，矿区工人参加解放军的达一千多人。

一九四九年阴历二月十二日，在我百万雄师即将跨过长江，直捣蒋匪巢穴的时候，应城敌军仓惶逃走。矿区武装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整装出发，两百多个工人扛着枪，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批开进应城，把红旗插上了应城城墙高处，在一片欢腾声中，迎接着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的到来！

## 十九 奴隶们站起来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应城，揭开了矿区历史的新的—页。

党和人民政府一开始就关怀着矿工们的生活和矿山生产的发展。应城解放前夕，矿区资本家纷纷逃往汉口，膏盐生产陷于停顿，工人生活濒临绝境。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矿区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进行生产自救，恢复了三对膏洞和七十多个盐厂的生产，初步解决了几千工人的生活问题。

武汉解放后，资本家陆续回到应城。矿区政府和工矿局

遵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协助资本家组成“应城膏盐股份有限公司”，鼓励他们从事正当的营业活动，对部分资本家还给予贷款扶助。同时，又引导工人，成立劳资协商会，与资方一起共同解决生产和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贯靠投机诈骗和残酷剥削工人来牟取暴利的矿区资本家，在刘少奇的“要和工人斗争”、“剥削越多功劳越大”等反动谬论的纵容下，向工人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不仅不维持生产，发展生产，反而抽走资金，大量拖欠工人工资，大肆偷税漏税，拖欠国家银行贷款，违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群众的利益。这样，工人的生活不仅不能改善，反而日益困难，甚至有个别工人被逼死。这是一场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对资本家不予以回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党的领导下，矿区工人奋起回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开展了群众性的反拖欠斗争。一九五一年三月，全矿区五千名工人联名向省报写信，在社会上揭发了矿区资本家迫害工人、破坏生产的大量罪行，要求政府予以制裁。五千工人的联名信登报后，全省工人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膺，声援信象雪片一样地飞向矿区和报社。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将李季侯、蒋思德、杨友吾等三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动资本家处以死刑；对拖欠工资、逼死工人的盐厂老板卢松波判以徒刑，并勒令其清还所欠的工人工资。

接着，人民政府又根据矿区的具体情况，对矿区的三对

膏洞和七十三家盐厂分别进行了处理，使大多数盐厂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膏洞则全部由国家接管。

与此同时，矿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扫除了野蛮残酷的封建把头制度。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大把头叶友保、陈老四受到镇压。

从此，多少年来统治矿区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旧生产关系寿终正寝，社会主义的新生产关系建立了起来。昔日被压迫、被奴役，过着地狱生活的奴隶，获得了彻底翻身，成了矿山的主人。工人不仅参加生产，而且参加矿山管理，领导生产。通过厂矿的职工代表会议，广大工人对厂矿的革命和生产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工人被提拔到企业的各级领导岗位。

企业广大干部，包括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有一个矿井需要掏槽，为了不影晌生产，矿长带领全体干部和部分工人，在春节放假期间，下到井里，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日夜奋战，原计划一周的任务，三天全部完成。更可贵的是，有的干部做到了那里危险就出现在那里。一九五一年底有一个膏洞穿水，危及成百井下工人的生命。矿井负责干部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下到井底，组织工人撤退，在全部工人安全脱险后，他自己才最后上到井面来。工人们对比解放前穿水时，资本家、把头的态度和造成的惨剧，非常激动地说：“旧社会，资本家、把头把我们工人当根草，新社会，党和毛主席把我们

工人当个宝！”

广大干部遵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在解放初期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旧膏洞井筒小，吊车设备差，几百工人要在八小时内对换下井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工人的身体健康，当时采取四天一轮换的办法，即下井四天后，上井休息四天，不是象过去那样一下井几十天、半年。在井下也充分照顾到工人的休息，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不分昼夜连续劳动。井下设立食堂，休息处铺上了木板。井上住宿处则全部是高铺，并利用废盐厂的砖瓦新建了五百多间工人宿舍。

一九五一年开始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被资本家和把头严重摧残，四十来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工人，提前退休，领取劳保工资，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一九五二年实行第一次工资改革，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按物价折合，比解放前最高工资水平增长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一九五一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童工摘掉了文盲帽子，矿上普遍开办业余学校，保证了工人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工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翻身，必然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资本家经营时，一对膏洞月产膏不到五千抬，国家接管后，不到两个月，产量就突破了万抬，创造了矿区几百年来没有过的奇迹。月产万抬的消息震动了应城，资本家纷纷前来参观。一切看来依然如旧，产量却突然翻了一翻，奥妙在那里呢？资本家十分纳闷，于是向工人请教。工人说：“这里并不是一切如旧，而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我们是奴隶，现在我们是膏洞的主人。”

## 二十 百年矿山谱新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应城矿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著名的应城膏盐矿区，到解放前夕，实际上是一片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混乱场地，是一个生产无法进行的破烂摊子。国家接管的三对资本家开办的膏洞，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开采年限极短。一对仅仅开采了五个月，就因穿水而报废，一对开采了一年，也因接近旧洞和井筒开始崩塌，为了工人的安全而关闭。另一对膏洞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只开采到一九五三年。

工人阶级从来就不是靠“遗产”过活，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新生活。解放后，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维护旧膏盐矿厂的生产的同时间，于一九五〇年五月成立“应城膏盐公司”，着手开建新井。

建设什么样的井？这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象过去资本家那样打井，投资少，利润大，而且有经验，保险。但是，那种井井筒小，巷道矮，摧残工人身体，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所不能采用的。尽管当时国家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政府仍决定建设新型矿井，打大井筒，挖宽巷道，矿井上下的运输线路搞轻便铁道，为以后逐步实现机械化创造条件。这一决定深受广大工人的拥护。他们发挥冲天干劲，排除各种困难，仅用了一年时间，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使第一个新型矿井投入了生产。

在第一个新型矿井建成的同时，国家即派来钻探队，在

富水河东岸日夜钻探了一年多后，否定了“过河无膏”的传统论断。于是，一九五六年又进一步跨出了旧矿区，在河东建设起一个新矿。大富水河两岸巍然挺立的两座现代化矿井架的出现，标志着新矿区的形成。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国家决定兴建一个规模更大的三号斜井。这个工程任务重，时间紧，困难多。但是，矿工们心红志坚，他们豪迈地说：“一颗红心两只手，蓝天大地绘新图！”“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掘进井筒工程五百四十多米，出土七千多个立方，都是工人用双肩一筐子一筐子挑出来，几百米铁道所需要的铁轨枕木，又是工人一根一根地扛进去。一对二百四十米深的矿井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就打到了底。与一九五六年建成的一百八十米深的二号竖井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年零四个月，投资费用节约了一半，并且在建井过程中出了产品。

建设盐井更是应城矿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解放前，应城矿区以产盐著称，但长期以来都是利用旧膏洞岩层中夹杂的零星盐分制盐，并没有找到过纯粹的岩盐矿藏。三十年代有一个留过“洋”，懂得一点采矿技术的资本家，曾聘请一个“洋人”用钻机向地下钻探过，可是没有钻多深，钻头就掉在钻孔底取不上来，“洋人”没有办法，只好溜走。解放后，一九五七年，在深入钻探石膏层时，终于发现了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浩瀚的结晶盐海。膏矿工人欢欣鼓舞，心潮澎湃，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喜讯传千里，热流暖全身。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矿区东部的烧香台山破土开钻，

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就钻到了二百八十米的深处，到达了层次又多又厚的岩盐层，高速地建成了第一对现代化的盐井。一九六〇年，应城盐矿从膏矿分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营企业。从此，应城盐矿与应城膏矿，在激流滚滚的大富水河两岸比翼前进，成为全国非金属矿业中的一支生力军，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随着矿山建设的飞跃发展，一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在膏矿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割岩机试制小组。他们从截煤机的构造原理中得到启发，画了一张试制割岩机的示意图。但是这张示意图不符合机械图纸的要求，不能根据它制造这部设想中的机器。工人们刻苦钻研，虚心学习，根据实践经验，不断修改，终于画出了一张既符合制造要求，又符合石膏开采特点的机械草图。在投制过程中，机电车间设备不全，工人们因陋就简，修旧利废。没有铣床，就把刨床当铣床用，割岩机所需要的齿轮，暂时生产不出来，就向废品公司买汽车上用过的旧齿轮。这样经过反复实践，不断修改，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采割石膏的第一台割岩机，并且陆续生产出了七种不同型号，支援了山西、湖南等兄弟厂矿。

这些割岩机每小时一般可割岩十二米左右，如以四个人操作一台计算，比手工斫槽效率高二十倍，而且比手工斫的槽要深得多。当第一台割岩机顺利进行操作表演时，老工人含着热泪兴奋地说：“自古以来，采膏用的工具就是锤子和斫子，现在我们要永远跟这两个家伙告别了！这是我们工人又

一次得到了解放，是毛主席领导的胜利！”

一九五六年又试制成功两种型号的电动钻孔机；接着，井下总巷运输的手推矿车改用了有轨电动车；矮门运输试制成功了电动滑车；井下照明用电的高压电源改为安全的低压电源。

这一系列的技术革新，使矿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清除了“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流毒，广大职工以大庆人为榜样，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现有条件，自己武装自己，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路子越走越宽广。他们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正确处理“大与小”、“土与洋”的关系，做到立足于用，不论大小，讲究实效。几年来，又制成了装碴机、刮锈机、多能刨、摇摆磨、多速马达、井口自动脱钩器、汽车吊车等十几种矿山机械设备，提高了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仅仅两个矿井的年产量，比起旧中国应城矿区膏洞最多时的年产量，就高出好几倍。

今日的膏矿，已经拥有各种机械电力设备七百多台，汽车七十多部，从巷道掘进、割岩、采膏到运输，从井下作业到地面操作，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

随着矿山生产和建设的飞跃发展，矿工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井下各条巷道先后安装了四十多台抽风机，使井下每个工人每分钟得到的风量超过六个立方米，矿工们无论在多远

的工作面工作，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同时，井下还安装了一万多米防尘水管。国家每年用于井下通风防尘费接近三十万元。职工全部享受免费医疗，职工医院定期对职工的身体进行检查。

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矿区职工的生活就好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解放二十二年来，党和国家拨款，在矿区陆续建设了将近三万平方米的工人住宅，职工都搬进了新居。许多职工不仅戴上了手表，购买了自行车，而且家里还添置了缝纫机、收音机、毛线衣、料子衣。矿区设立了幼儿园一所，子弟小学三所，初中高中各一所，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现在有一千多名职工子弟在各级学校里学习。青年矿工一般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许多老矿工经过参加职工识字班、业余学校的学习，也大都能读书看报了。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从小就在洞下给资本家当童工的老矿工卢元义，一九四三年，父亲带着他们弟兄四个沿途讨饭到应城，出于生活所迫，父亲忍痛把他们送给资本家当童工。这时，他们弟兄四个，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七岁，卢元义八岁。不久，他的弟弟和一个哥哥死在资本家的皮鞭下，还有一个哥哥逃出虎口，投奔新四军。卢元义本人也是鞭痕满身，吃尽了人间的苦难和辛酸，有一次把头曹和尚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幸亏阶级兄弟的帮助才从死里逃生。

解放后，毛主席、共产党把他从苦海中救出来，卢元义翻了身，兴奋得几个夜晚没有睡着。他说：“旧社会，资本家

把我们工人当牛马，吃不饱，穿不暖，累死了无人管。新社会，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当家作主，不努力工作，就对不起毛主席、共产党！”这个苦大仇深的老矿工，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一九五二年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余年来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为革命工作，是一名老模范。

现在，他全家六口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念书。大女儿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小孩子的胸前也飘起了红领巾。每天下班回来，孩子们跳起欢乐的舞蹈，唱起革命的歌曲。卢元义的一家是矿区千百个翻身矿工之家的代表。

入夜，十里矿区，万盏电灯齐明，上千部收音机一齐开放，工人新村热闹异常。灯光球场上，篮球队员们的精彩球艺，博得了观众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宛如白昼的职工阅览室内，老矿工正在聚精会神读书看报。灯火辉煌的工人俱乐部里，歌声嘹亮，在激情的乐曲声中，矿区业余文艺宣传队唱出了百年矿山的新歌：

大地换新装，老矿展宏图，  
我们的矿山象辽阔草原上的骏马，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飞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 后 记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在上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与重视下，我们编写了《应城膏矿史话》，作为对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这本书还不能概括应城膏盐矿区阶级斗争的全貌，还会有不少缺点与错误，渴望广大工农兵读者，尤其是熟悉矿区历史的革命前辈，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进一步修改提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武汉大学领导和政治经济学系师生的热情帮助；许多革命老干部、老工人、老贫农也热情支持编写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七二年七月

